

# 媒体悬崖

PRESS FREEDOM IN CHINA 2013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

國際記者聯會

Residence Palace, Bloc C  
155 Rue de la Loi  
B-1040 Brussels, Belgium  
Tel: +32 2 235 22 00  
Fax: +32 2 235 22 19  
Email: ifj@ifj.org  
http://www.ifj.org

## IFJ Asia-Pacific

國際記者聯會亞太區分會

245 Chalmers Street  
Redfern NSW 2016, Australia  
Tel: +61 2 9333 0999  
Fax: +61 2 9333 0933  
Email: ifj@ifj-asia.org  
http://asiapacific.ifj.org

This report has been produced with part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Alliance Safety and Solidarity Fund, which comprises contributions from journalist members of the Media, Entertainment & Arts Alliance of Australia.

本報告之部份經費由澳洲媒體、娛樂與藝術聯會屬下安全及團結基金贊助。



**Author** 撰稿: Serenade Woo

**Editor** 編輯: Kathryn Bice

**Special Thanks to:**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and The Associação dos Jornalistas de Macau

特別鳴謝: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及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



Members of several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protested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Liaison Office, the agent of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to condemn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repression of press freedom, in the past four years while China was applying to be re-elected as a member Sta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Image: Serenade Woo)

# 内容

1. 前言	2
2. 介绍	3
3. 中国大陆篇	5
2013年中国舆论管控的新特点	13
中国媒体人要组织化抗争，还是体制化生存？	20
4. 驻华外国记者篇	25
5. 互联网篇	31
6. 香港篇	35
香港传媒业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41
澳门新电视模式 鬼影重重	46
7. 建议	50

# 序言

国际记者联合会因应中国北京于二零零八年八月主办奥运会, 同年遂开展监察及报告中国的新闻自由及违反媒体工作者权益的个案。国际记者联合会首份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年报, 题为《中国奥运的挑战》, 评估二零零八年间媒体的工作环境。当中录得多起侵犯记者权益及新闻自由的个案, 不过, 当时仍有乐观相信中国会继续向前推进, 即使步伐缓慢, 但仍会为中国本土及海外记者有一个相对更自由、安全及工作环境保障的方向前进。不过, 二零一一年二月, 随着中东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后, 情况便急转直下。众多记者被撤职或被迫离开岗位, 媒体每天接获十多项的禁令及多个网站被封。

不幸地, 这些情况一直没有好转。二零一三年, 情况更恶劣。自中国「太子党」的习近平获选为中国国家主席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前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获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兼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席后, 中国便普遍地被形容为倒退到毛泽东的年代。新一代的领导人说, 要强化媒体作为党的工具, 展开一轮媒体战。多位知名的博客及记者在电视上招供认罪、数以万计的网上留言被删除及众多网站被关闭。

十一月, 中共在三中全会后便立即决定强化舆论引导及镇压互联网。「微信」立即成为官方针对监控的对象。经常使用「微信」传递信息的众多记者突然间, 接获上级指示要停止使用。驻华的海外记者持续地经验到挑战。官方按记者报道的内容决定他们的工作签证是否获得续签, 此外, 记者受到滋扰及生命威吓的事例仍旧发生。二零一二年, 两所国际媒体因揭露

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及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拥有非一般的财富后, 两媒体的网站在中国境内便被屏蔽一直致今。

不过, 二零一三年也有数项正面信息的事件发生。两所媒体机构的记者为捍卫自身的权益, 勇敢地踏出罢工的一步, 抗议政治干预编辑独立及超低的工资。中国的司法部亦尝试「公开」, 除开始准备上载法庭判词到网站外, 亦透过微博广播数起社会极为关注的重大刑事案件, 当中包括蒙羞的前中共领袖薄熙来。不过, 官方仍旧行使筛选的权力, 拣选一些记者进入法院旁听审讯。

香港媒体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媒体机构及记者被流氓及亲建制的民众袭击。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发展是, 香港政府试图利用法律程序迫使媒体向官方交出新闻材料。媒体竞争亦见恶化。敢言的媒体拥有人申请免费电视牌照被拒, 引来众多怀疑包括申请规则遭单方面更改。事件引起社会及业界极度愤慨。

香港特首及其管治团队持续地采用逃避的方法, 放弃过去传统采纳公开透明的良好管治模式。媒体亦同时要面对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政治施压。

国际记者联合会促请各媒体工作者保持警觉。国际记者联合会能够开展监察中国新闻自由的工作, 有赖于中国大陆及以外地方不断扩张的联络网能向本会提供消息。消息提供者的名字虽必须保密, 但是, 没有他们的努力, 本会的报告实难以完成。

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

二零一四年一月

# 简介

二零一三年, 中央政府对媒体的态度持续视为政治工具, 宣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情况的倒退更重返毛泽东的年代, 不过, 官方集中针对的对象是互联网的网民。监控媒体已不再只是政府部门及机构的工作, 公安亦参与其中限制网上言论自由。众多记者及博客因为在网上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 或响应官方呼吁实名举报官员或商界的贪腐行为后, 竟被官方控以不同的刑事罪行。被起诉的人士中, 较知名的博客及记者会被官方安排透过电视播放他们的认罪, 可是, 没有独立第三者在场确认有关的认罪, 是在毫无任何的胁迫下而招认。众多的网站被关闭, 数以万计的网上信息被删除。多名记者因拒绝依从官方下达的政治指示而被迫辞职、停职、降职或受到威吓。限制媒体采访报道的禁制令持续发放, 尤其在敏感事件发生后一定发放, 如新疆连串袭击事件。

在二零一三年起, 众多中国人包括记者在内对新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抱有良好愿望。不过, 当习近平委任中宣部原部长刘云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 众多记者明白能够实现言论自由的梦变得渺茫。当刘云山另获委任为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后, 不少记者更想不到言论自由的恶化情况竟致于此。网络媒体发展踏入二零一三年时, 相对仍可为中国带来自由的空间, 但是, 其后却成为官方针对控制的对象。十一月,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清楚述明, 加强舆论引导及加强打压互联网。习近平在会议后说:「互联网及信息安全是牵涉到国家和社会稳定, 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

他更特别提及微博及微信新的社交通讯工具极需关注。众多记者期后接获上级的警告, 要求他们立即停用这速递信息的工具。其中一名记

者向本会表示, 上级要求他停用微信因为他受雇于该媒体机构, 而他使用该通讯工具发布信息就会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当该名记者查询若拒绝接受该指示时, 记者被告知会被要求辞职。官方能够验证谁是活跃的网民包括微信的用户, 因为背后有大量的人士包括大学生, 已良久协助官方监控网上信息。官方已聘用了二百万名人士负责监控六亿的网民, 而此工作更被视为专业, 当事人需接受培训及专业考证。

不管如何, 二零一三年的确有些正面的发展。两所媒体机构记者先后因政治干预编辑独立, 及超低工资的问题而抗议及停工。同时间, 中国司法部亦作出「公开」的举措。司法部正准备把判决书上载到互联网, 及用微博播送一些社会关注的重大刑事案, 如中共前领导薄熙来的审讯。不过, 官方仍限制记者进入法庭旁听薄案的审讯。

海外媒体驻华的记者持续遇到多个挑战。一方面, 官方继续以媒体报道的内容来决定是否签发记者的工作签证; 另一方面, 滋扰及生命威胁的事件仍旧发生。两所海外媒体二零一二年揭发了, 现任中国主席习近平及前总理温家宝拥有不寻常的财富后, 两官方网站立即在中国境内被封直至现在。

香港媒体的新闻自由已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自从现任特首梁振英于二零一二年七月上任后, 媒体以致公众在摘取信息, 特别是当一些引起社会愤怒的事涉及到政府个别高官的敏感事件发生时, 都遇到重重障碍。不过, 最滋扰的发展是, 敢言的媒体似成为针对的对象, 及梁振英与行政会议单方面更改免费电视牌照的申请规则。敢言的《壹媒体》集团更遇上多次袭击。在法律程序下, 两所媒体被强迫交出新闻材料。数名媒体雇主遭到袭击, 而《壹媒体》集团更被全面杯葛。

国际记者联合会联同多个非牟利团体在联合国召开普遍订期审议中国过去四年的人权状况的会议前，召开研讨会及向联合国递交报告。本会在报告中罗列了中国践踏新闻自由的事件，当中包括惩罚捍卫新闻自由及表达自由的记者及维权人士。同时间，中国违反了二零零八年奥运后承诺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拥有新闻自由的诺言。本会在香港向多国领事进行游说时，犹幸知悉多国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倒退都非常关注。十月份，联合国普遍订期审议会议时，多国代表在席上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注，不过，中国继续不予理睬这些抗议声音。

二零一四年，香港将有众多重要事件发生，当中包括亚太经合会议九月份在香港召开，还有可能会在香港金融区发生的「占领中环」抗议活动。「占领中环」运动缘于香港市民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及香港政府在二零一七年普选特首时，许予香港人有真正的全民选举。不过，「占领中环」的诉求一开始已遇上建制派议员、政客、香港政府及中国中央政府以其违反《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予以驳斥。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中国成功再获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委员会委员，不幸地，中国同时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及进一步限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这些举措已引起社会极度关注。

国际记者联合会促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尊重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精神，这些早已订在中国宪法内。我们同样促请中国官方采纳联合国保护及倡议言论及表达自由专员的A/HRC/23/40报告书。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员应履行道德责任，高举专员的报告之余，应尽快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公约中国早已在一九九八年签署。

国际记者联合会强调，中国进行的通讯监控已损毁表达自由的精神及个人私隐。本会促请中国官方停止监控，因为有关做法进一步收窄言论自由。中国在全球中是拥有网民最多的国家之一。

我们同样促请香港政府遵守良好管治的运作，订立《信息自由法》彰显向人民问责的承担。我们又促请香港及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不单要捍卫新闻自由，同时，报道时要保持中立。我们相信中国大陆媒体的收购潮将于二零一四年持续发生，并相信会给记者带来更大压力，令他们成为标准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不过，本会必须提醒所有媒体工作者，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人民，并不是任何的政治团体、政府或企业。新闻自由及表达自由是基本的人权，此权利建立了人民可通过任何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与思想的自由。

# 中国大陆篇

二零一三年初, 众多中国公民期望新一届的领导层能够建立一个更思想开放及理解人民的需要及困难的社会。为显示此强烈的诉求, 当时有逾千人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联署致函予全国人大常委会, 要求中国落实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保障及倡议新闻自由。新闻工作者都希望中宣部、国务院下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及其它政府机构发出更少的指令, 给予更多的新闻自由。

尽管希望如此, 中国大陆在二零一三年整年间的新闻自由状况毫无改善, 相反, 官方更上演一出同心协力打压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专业记者、公民记者及网民。公安以散播谣言或其它指控为籍口拘押人。电视招供及盘问、审查、殴打、撤职、降职及停职的手段仍旧用来恫吓独立记者及评论员。



「太子党」的习近平获选为中国国家主席后便立即针对互联网, 并要求前中宣部部长,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叮咛所有媒体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网上图片)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新一届获选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下巡到深圳经济特区。邻近香港的深圳已被标志为「改革及开放」的表征。期间, 习近平说, 鼓励人民为更好的未来向前走。根据《人民日报》报道指, 习近平谓: 「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他又说: 「我们要坚持这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继续建设中国及改善生活。」

虽然有这正面信息的开始, 中宣部前部长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刘云山在一月四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重申, 媒体的角色只是宣传党。

三月十四日,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 习近平获选为中国主席兼军委主席。习近平被贯有「太子党」称号, 其父亲习仲勋是资深的共产党党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亦受到迫害关押, 习近平当时只得十五岁, 与亲人活在困窘中。当他获选后, 众多中国人以致国际媒体都期望在其领导下, 中国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更向前迈进。

不过, 在习近平出任中国主席后不久, 中国政府把两个监管电子及纸媒的部门合并成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总局)。不过, 总局的角色仍旧不清晰, 又未有改善政府在现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改善部门发放信息的责任。

六月二日, 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去逝, 有关死讯拖延至六月四日更是由《香港中国通讯社》披露, 社会方获悉有关消息。这正好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显示信息发放并无改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城事件中, 陈希同当年出任北京市市长, 被指控为下令批准解放军进入北京城。不过, 根据一本中国政府视为禁书的内容指, 陈希同

指当年下令军队进入北京城的是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他只不过是代罪羔羊而已。

更多的限制令出现在其它领域。三月廿二日，《财新杂志》报道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上海分局突然更变信息发放的规则，事前却未有交待更变的原因。该局指，只有律师携有法庭的命令或调查令方有权查阅商业机构的登记注册数据，情况跟另一起事件类近。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一名在云南省从事艾滋病教育活动的职员向当地民政部索取，受感染儿童获得政府资金补助的总人数时，民政部职员响应谓：「你需要向公安局取得一纸合法公民的证明，否则，我们害怕数据会被坏人使用。」不过，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订明，任何中国公民均有权摘取信息，再者，当中并没有厘订「合法公民」与「不合法公民」的定义。

### 承诺「公开审讯」但媒体报道仍严受限制

正当中国全国响起「依法治国」的口号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了重要迈前的

一步，在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中安排「公开」审讯。根据《中国日报》五月三十日的报道，周强指中国的法院应给予媒体便利，及给公众意见提供司法支持。他说，在法律要求下，法院应进行公开审讯，倘不能够时，法院应给予原因解释。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所有中国法院的判词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上载到官方网站上。根据《法制日报》报道，周强指所有判词上载是基于「公开」的原则，任何人不能随意更变。

国际记者联合会欢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有关新决策，并认为方向正确。不过，本会对于所有中国法院并未全面落实推行有关新的指引表示遗憾；有关「公开审讯」的理解，中国的定义更明显有异于国际间理解的「公开审讯」的定义，因为中国的公众要进入法院旁听审讯，事前仍必须先得法院的批准，方可进内。同时间，根据《新华社》报道指，有四类案件的判词包括涉及国家秘密、私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调解方式结案及「其它不宜在网络公布的」判词则



重庆前党委书记、「太子党」薄熙来的刑事审讯案，期后被发现审讯过程中有不少部份被筛选。（网上图片）



不会上载,虽然内容跟最高人民法院早前公布指所有判词会上载公开的决定有不同。但是,报道未有进一步交待原因,兼且亦未有交待法院会否停止审查媒体,容许所有媒体可进入法院内履行采访职务。现时所有被标签为「反政府」的媒体都不获准入法庭。

不过,中国的法院的确创造了新的方法,在审讯重庆前党委书记薄熙来的案件时,达致「公开审讯」的目标。在有关审讯中,中国法院利用微博传送影像让公众收看,此举广泛地受到社会欢迎。薄熙来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廿五名委员之一。根据《环球时报》报道指,薄案在七月廿五日开审,他被控收受商人贿款二千一百七十九万人民币(约美元三百五十万)、贪污大连政府的公款五百万人民币,及滥用职权罪,并让变节的党羽王立军于二零一二年处理薄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的事件。薄案在山东省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政府声称的「公开审讯」乃指法院利用微博户口在庭内,安排摄录队伍把审讯时的影像传送及上载到微博户,达致公众在法庭以外仍可观看案件审讯的效果。

不过,这「公开」之意有很多瑕疵,因为微博播送的审讯内容是经过筛选,政府亦拣选了一百人及十九名记者进入法庭旁听审讯,然而拣选的准则,未有公开交待。众多记者在法院外被安排在就近的指订酒店观看官方每天用微博传送的影象及审讯内容。可是,所有的影像及文字传送都并非实时传送。案件经过五天审讯后,在法庭内旁听的记者向其它记者透露,有部份审讯的内容在微博上被删除,但是,有关部门并未有解释。此外,所有前赴采访的新闻界都被安排在远离法院大楼的指订地点拍摄,由于距离法院很远因而记者难以采访进出法庭的人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即使站近警戒线进行直播,仍被公安及外事办人员阻止限制。有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更投诉被不知名的人士跟踪。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刘延杰更违反

承诺,在案例审结后并没有安排记者提问环节,在数次的记者会上,刘只是单方面讲述已预备的官方信息,并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

中国大陆多名法律学者确认薄熙来的「公开」聆讯是中国司法制度中史无前例的。法院展示了公开及透明。不过,多名人权律师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有关的公开及透明远低于真正的司法公开及透明之意,因为无独立的媒体及公众可以进入庭内旁听,再者,他们指裁决是由党决定,并不是由法院根据证据及相关法例作出裁决。

十月廿五日,薄熙来就其无期徒刑的惩处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不过,官方在是次的上诉中并没有再安排微博传送影像。当媒体向法院追问是次安排何以跟下级法院有异时,官方并没有给予解释,职员只不断重复指法院旁听席有限。高级人民法院的发言人只读出已预备的法院判决书,之后,再没有响应媒体任何的提问。其实,中宣部在处理薄熙来案件时,早有预备,在七月廿五日及十月廿三日即法院聆讯前,已下达限制令着所有媒体只能转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另外,官方仍严控微博上有关薄的消息。不过,一名在香港大学专注研究微博审查系统的研究员对本会表示,微博上出现薄案的消息出奇地多,并没有严厉的审查迹象。

### 公安及法院限制网络自由

国际记者联会了解到,公安在媒体内党的人士配合下,导致有数以千计的人士被公安指控及扣押,同时间,亦有数以千计的网站被封锁。根据公安推行的「净网行动」,凡官方认为信息会导致社会不稳,发出信息的网民都会遭公安指控。起初,公安主要以「散播谣言」引起「社会秩序混乱」作为指控及扣押网民,但是,就未能展示相关证据。有关行动似要针对网上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高举毛泽东的管治(网上图片)

知名的公民记者及博客。当律师及评论员质疑公安滥用权力, 错误使用法律提出指控, 及未有提供证据证明后, 公安开始使用更严的控罪, 当中包括「损毁商业声誉」、「刑事诽谤罪」、「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罪」、「非法经营罪」、「聚众淫乱」、「散播谣言」、「制造虚假信息」、「制造虚假注册」及「扰乱社会秩序」。

中国主席习近平上任后, 已尝试收窄社会的讨论。五月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会议后, 传出有「七不讲」的清单, 当中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及权贵资产阶级。

八月份,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八月十九日, 习近平在会议上提醒所有党员要紧随毛泽东的政权包括坚持党

管媒体, 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及办新闻网站。习近平又谓:「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 根本不是, 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 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 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又讲, 互联网已成为影响舆论的重要阵地, 所以, 互联网将会是重要的平台倡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他更认为政府应该「依法加强管理互联网」确保「互联网受到控制」。

八月, 官方又促成多间互联网公司签订称为「七条底线」的自我审查协议, 从而可取得官方给予数以万计的奖赏。十一月十三日, 《北京青年报》报道指, 网上平台新浪网承认自签订「七条底线」后, 有十万个微博户口分别被短暂性以致永久性封锁。在十万个被封的户口中, 调查发现有超过七成的网上信息被指进行人身攻击, 不过, 就只有一千零三十个信息被指涉及散播虚假信息。微博户被短暂封锁的时间由五至十天不等, 在该时段, 网民不能张贴信息或转载信息。最恶劣的情况是永久封锁户口, 可是, 有关报道并没有交待相关的数目。

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发展在九月发生。针对网上谣言及诽谤的信息问题, 九月九日,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 新的司法解释指, 网上谣言信息被点击达五千次以上, 或转发达五百次以上, 该张贴信息者便有可能被控以诽谤罪, 最高刑罚判监三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孙军工指, 在一些社会敏感议题上, 网民有制造谣言及制造虚假信息, 扰乱社会秩序及促致「群众事件」, 此做法足以构成犯罪行为, 需予惩罚。不过, 他指有关做法无碍官方鼓励网上实名举报的做法。孙强调:「即使有些指控的细节或揭示的信息并不真

实,只要网民并没有意图制造虚假信息影射他人,他们并不会被控诽谤罪。」

六月份,公安部以打击网上罪行特别成立小组严控网上信息。八月份,安徽省的公安厅公布,自有关行动推出后,有四百二十七人被扣押,有二百零八人被拘捕及一百四十三人被行政处罚。有关的行政处罚,乃容许公安在毋须经过司法程序下,将当事人扣押数天至数星期不等。

在打击行动开始时,公安以「打击网络谣言或信息危险社会秩序」为籍口审查及删除信息,扣押及惩罚网民。众多网民因张贴信息后而被公安惩处。独立歌手吴虹飞七月廿一日因在微博上发出「炸北京建委及居委会,旁边的麦当劳炸鸡及薯条」的信息后,公安认为吴的真意是想「炸北京建委及居委会」故处予行政扣押十天惩罚。不过,八月二日,公安准许吴缴交人民币五百元(约九十六美元)罚款后予以释放。她期后接受《南方都市报》访问时指,她当时也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不过,她肯定没有想「炸毁」官方机构的想法。

八月九日,知名公民记者周禄宝被江苏省公安指控敲诈罪。周过去经常在网上揭露多名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当中包括甘肃省兰州市长袁占亭疑涉受贿事件,因为袁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至少展示了有5只名表,当中包括劳力士及江诗丹顿等价值高昂的名表。当周禄宝在网上揭露后,吸引众多媒体包括官方媒体《新华社》也跟踪报道,不过,公安指周全国性撰写的负面报道,目的是敲诈金钱,更指他可能涉及制造网上恐怖信息。

八月十九日,另一知名博客秦志晖,笔名秦火火,杨秀宇及另外四人被北京公安指控网上制造谣言。公安期后再加添其它控罪包括损毁商业声誉及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罪名。公安指,秦及其它人建立一间公司专门协助他人,在不同

的网络平台贴文赚取利益,又指他们制造谣言是为了使自己出名。公安并以温州动车事故及共产党民族英雄雷峰为例。秦被公安逮捕兼起诉的消息,官方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耗时报道。



知名博客薛必群,笔名薛蛮子,原被公安指控扰乱社会秩序,但是,期后却改为聚众淫乱,并在官方电视媒体上播出他「认罪」。(网上图片)

八月廿三日,知名网上评论员薛必群,笔名薛蛮子,被北京公安逮捕及指控聚众淫乱罪。不过,公安原先指控薛扰乱社会秩序。薛过去一直就社会公众事件敢于批评,因而其微博粉丝高达近一千万人。他被公安逮捕后,立即引起网民猛烈批评,官方更安排在《中央电视台》详尽报道他招供认罪的消息。

九月十三日,自由主义者兼商人王功权被北京公安指控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捕。王及其它新公民运动的成员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公民权利,有关权利已在中国宪法中作出保障。他们同时启动「释放许志永」的签名运动。法律学者许志永于二零一三年七月因公开呼吁官员公布财产而被北京市公安拘捕。王及许是新公民运动的核心成员,二人的微博户口也有大量的粉丝跟随。二人的户口被封前,据报王功权的微博粉丝量有高达一百五十六万人。



《纽约时报》前摄影记者杜斌撰写及出版《天安门屠杀》书本后，被北京市公安指控煽动及扰乱社会秩序。（胡丽云摄）

众多评论员深信政府拘捕王及其它人的目标是要打击微博大V的用户，因为微博用户的身份都必须经过核实及认证，而其粉丝量亦必须要达致一个非常巨大的数量方可取得相关代号，换句话说，取得有关代号者极具社会的影响力。同时间，相信官方亦希望藉此向公众发出清楚的信息，即是任何独立的公民组织都不获政府准许。

### 记者扣押后被安排电视招供

公安继续以扣押及电视招供的方式针对在职记者。五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前摄影记者杜斌撰写及出版《天安门屠杀》书本后，被北京市公安指控煽动及扰乱社会秩序，不过，

公安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杜被惩处相信与其出版讲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事件的书本有关。有关书本是杜斌看罢多本相关的书后写成。书中，杜厘清事件发生的时序，再重申编写。不过，他特别提到在六月四日当天北京市内数名人士看到的事物。杜斌过去亦撰写了数本敏感的书本，因而早已被国保滋扰，给他带来压力。他被捕前，业主已遭公安警告着杜斌不要跟外界人接触。杜被公安逮捕当天，公安搜查其住所，并捡走他的计算机及书本。七月八日，杜获准保释，事实上，杜由被捕以致释放的两个月过程中，从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处理。

八月五日，广东媒体《时代周刊》记者宋阳标因在网上发表支持蒙羞的重庆市前党委书记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在雇主《新快报》连续两天头版刊登「请放人」的字眼后，《中央电视台》广播陈招供「认罪」，收受金钱撰写连串针对一间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网上图片）

薄熙来的贴文后，被北京公安指控扰乱社会秩序。宋于八月十二日获准保释，被行政拘留七天。

八月廿三日，广东媒体《新快报》记者刘虎被北京公安指控在网上散播谣言。不过，九月公安更改有关控罪为刑事诽谤罪，并公开确认已逮捕刘。刘被捕疑跟七月廿九日在网上实名举报，案发时出任重庆市副市长，现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牵嫌贪腐一事。实名举报获官方鼓励进行，呼吁网民用自己真实的名字对行为不妥的官员作出检举。

十月十八日，长沙公安扣押广州报纸《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指其撰写连篇负面新闻针对上市公司中联重科，致其商业声誉受损。《新快报》在十月廿三日及廿四日连续两天，在头版刊登要求公安「请放人」的报道后，根据《中国数字时代》指，中宣部自《新快报》于十月廿三日头版后，已发出禁令禁止媒体利用头版或在网页显著的位置报道。全国记者协会以致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都先后表示关注及会彻查事件。十月廿六日，官媒《中央电视台》突然报道陈永洲的消息。镜头前，陈招认收受五十万人民币的款项撰写连篇上市公

司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陈永洲的注册记者证已被永久取消，《新快报》的社长及总编辑均被撤走。

### 作家被指收受金钱为企业在网上撰文

九月十七日，李新德、葛树春及姜焕文被北京公安指控非法经营罪。根据《北京青年报》指，三人收取十万人民币替雇客在网上撰写及出版十篇文章。报道指，他们接受湖南省太康县国土局前局长成富才委聘，接受他提供的数据后，在网上撰写文章。他们签订的合约中订明，三人不会复核成富才提供的数据真伪，只会据数据写文章。公安高调逮捕周、薛、秦及李，并安排电视及报章报道他们的招供。官方是次的安排目标是向公众传递信息，官方并在「净网行动」的运动下再加强控制网络言论空间。此举响应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中强调党要严管互联网。

国际记者联合会谴责记者在出席记者会时，收受商界给予「红封包」的做法。不过，本会不会建议阻止任何商业活动。在李的个案中，三人明显跟委聘方签订了一纸合约，委聘方负责提供数据予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诠释《刑事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说明，要证明嫌疑人应该知悉资料虚假。在李案三人，合约中订明三人不会核实数据的真伪，因为负责方是委聘方而非三人。国际记者联合会相信中国官方有急迫的需要确保所有执法人员恰当地诠释及遵守法律。本会深信最恰当的做法是，公安必须先取得最高检察院的批准，才可扣押或逮捕嫌疑人。公安亦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执法合理及合法。

### 电视招供绕过法律程序及压制言论

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增加了广播知名人士未经法律程序在电视「招供」，引起众多记



众多普通公民反抗省宣传部干预《南方周末》的编辑部。(网上图片)

者、学者、维权人士及评论员均相信官方使用此「招供」的手段,是试图达致移除他们心目中视为危害、非法,特别是在网络公众领域中的虚假信息。未经法庭审讯而用广播「招供」的做法是践踏中国的法律。

在《中央电视台》广播的片段中包括嫌疑人被盘问的片段。据悉,大部份的片段都是由公安摄录,虽然,也有不少摄录是由《中央电视台》直接负责。姑勿论是那单位负责拍摄,这些都明显是倒退到毛泽东年代的做法。在毛的年代,强迫当事人认罪或忏悔都是惯常兼有力的做法,当中根本没有要求任何司法程序。不过,中国近年间经常称国家要依法治国,及朝着司法改革及司法独立的方向发展,嫌疑人在没有经过法庭审讯下,便遭公安用电视招供的做法使其认罪,这做法明显践踏司法程序的行为。这做法摧毁个人的声誉之余,亦损害媒体业。这做法明显赋有政治含意,制造寒蝉效应,挫败

公民履行个人的权利。更令人感到忧虑的是政治正掩盖法治。

此发展震荡了众多法律学者。纽约Fordham法学院教授Carl Minzner说:「利用国营电视台播公开招供是实验,这个做法完全独立于任何司法程序。这机制是向中国社会发出政治警号。」英国广播电视台就有关议题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法律学者Eva Pils时,她说,情况已显示重返毛泽东年代。

国际记者联合会相信《中央电视台》广播嫌疑人在未经法庭审讯下「认罪」,而报道中又未有交待嫌疑人是否自愿或是否受到压迫下供认,认罪报道已违反媒体的专业操守。

### 记者反抗党干部干预编辑自主

二零一三年值得关注的发展是有两所媒体机构的记者进行罢工抗议。罢工在中国境内被视为

## 2013年中国舆论管控的新特点

作者：赵无极

2013年，可能是这两三年来，媒体环境最为艰难的一年。无论是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还是以微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媒体平台，在这一年都遭到了中国官方（“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及整肃。从目前的局面判断，官方的管控取得了一定效果。虽然几乎随时都在遭受挑战，但官方依靠所掌控的资源，舆论主导权并没有旁落——当然，这是以其依旧以极权政体为依托的舆论高压。

要分析2013年中国舆论管制的特点，以及这种管制对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及新闻从业者工作的变化，视野至少得先拉回2011年初。

2011年初，“中国茉莉花运动”（亦称“中国茉莉花革命”）爆发，这一模仿于突尼斯及埃及等国的民众抗争运动，最后以官方进行有效控制收场。这一运动，民间和官方都呈现出了有别于以往的新特点。就民间而言，民间意见已经由“网上”到“网下”合流，并在网下产生了实际的行动。而官方，在十几年来因“稳定压倒一切”而建立并巩固的“维稳”政制，经茉莉花运动之后，确立并推广了所谓“网格化管理”维稳模式；而原来主要在现实行动中采用的维稳工作，也开始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媒体及新闻工作者，则成为了潜在的维稳对象。

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最先开启了今年媒体人的抗争行动。由于不满广东省宣传部门强力插手新年献词，南方周末

员工及若干新闻人，最先在网络上以联名抗议的方式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他们就保护“新闻自主”的诉求。新闻工作者们的诉求在网络上发酵期间，声援南方周末的网民则从网上走到了“网下”。网民们在南方报业集团大院门口聚集，抗议官方的新闻审查。毫无疑问，从网民声援南方周末的行动我们不难看出，这正是网民（公民）由“网上”到“网下”的意见合流。当然，官方对此类行为的压制毫不手软。以“政法口”为维稳急先锋，现实的公民抗命甚至抗争最终被打压、消声。

多年以来，中国官方打压民间抗议，是以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组成的“政法口”为主力；对舆论及新闻工作者的管控，则由包括中宣部领导的宣传部门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的新闻出版系统构成的“文宣口”。长期以来，“政法口”负责对实际行动进行维稳，“文宣口”对意识形态领域及新闻舆论进行管控。

2013年以来，党国对新闻舆论的管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为了应对民间由“网上”到“网下”的意见合流，以往仅依靠“文宣口”进行管控，现在则是“文宣口”和“政法口”合流相互配合以整肃舆论。“文宣口”和“政法口”合流，除了以往以敌我对立的方式进行整肃民间行动（如“茉莉花运动”）外，对本属于“国内矛盾”的舆论界乃至新闻界，为了重整意识形态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官方对民间意见乃至异见，持高压管控态势。

正是基于前述的统治逻辑，2013年9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就是“文宣口”和“政法口”合流

的明证。在新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

只要稍具法治精神，便不难看出“两高”被网民称之为“500转”的司法解释有着极浓的政治色彩。“两高”的这一司法解释，也只不过是“文宣口”和“政法口”早已合流打压民间意见的行为，赤裸裸的向大众宣示而已。事后证明，由前述新司法解释之后，警方掀起的以打击网络犯罪、网络谣言诽谤行为的“净网行动”整肃舆论目的明显，称之为对民间意见（异见）剑拔弩张强势镇压亦不为过。在“净网行动”中，不论是整肃涉嫌违法犯罪的网民言论，还是震慑“大V”，事实表明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短期内，寒蝉效应已经形成；10月浙江余姚水灾，相关灾情信息在网上没有获得及时全面传播即为一例。

极敏感的行为。《南方周末》记者的罢工行动是因为广东省宣传部政治干预编辑部而出现，而《兰州晨报》记者的罢工则因为争取提升工资而致。二零零五年《北京日报》记者进行间接性罢工，八年后，罢工重现。

引致《南方周末》出现罢工事件始于一月三日，不少读者发现该报出版的一辑新年献词的报道里，出现不少重要错误，期后，不少记者揭露该献词的头题题目被改，由原本是「中国梦宪政梦」变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据报，《南方周末》的总编辑黄灿并没有捍卫编辑独立。事实上，是次的干预并不是单独事件，该周刊前编辑透露，二零一二年便有一千零三十四篇报道遭到审查。

在新闻传播领域，“文宣口”和“政法口”的合流，在如“夏俊峰案”、“陈宝成案”、“薛蛮子案”及“陈永洲案”等案件中得到了具体展现。在这些事件中，两个部门联合对舆论进行整肃及管控，以期达到舆论一律的效果。这一“联合执法”的效果如何？从今年中国传媒界近乎万马齐喑的景象就已经可见一斑了。由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的意见》也表明，自今年6月到明年1月，已经开始在全国新闻战线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员培训。这是在前述两个权力部门合流之后，权力再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之举。由是观之，新闻人所面临的局势仍难以乐观。

未来将会怎样？最乐观的希望自然是“文宣口”和“政法口”各自归位，哪怕仍还是管控镇压，这仍会给民间一丝喘息的机会。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一迹象。（完）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周刊的编辑部就新一年的特刊题目提出建议后，未获总编辑黄灿接受，最终黄建议以「中国梦」为主题，他并主动着编辑部于翌日提交有关建议予省宣传部寻求批准。两天后，省宣传部就提交的建议作出多项修改，当中包括特刊内不能提及已故领导人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周刊评论员戴志勇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梦宪政梦」，并交予总编辑黄灿审阅。黄不满文章内容，认为文中强调宪政。十二月三十一日，编辑部主任史哲修改文章，将题目改为「中国梦梦之难」，黄随后主动修改，并将文章交予宣传部审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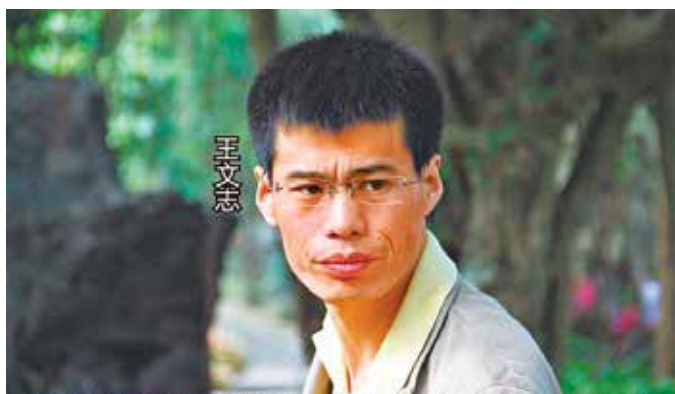
《南方周末》事件引起国际间关注。众多记者如澳门记者及公民用自己的方法表达对事件的支持。(澳门记者协会提供)

宣传部之后再把题目改为「梦想，让生命迸射光芒」，以配合官方要求正面报道的原则。同时间，宣传部亦删除数篇文章，把原本十六页的特刊删削后变成十二页。被删的文章包括年青人为小贩夏俊峰及其妻子张晶的遭遇而在什邡市抗议的事件。夏俊峰被公安指控杀死城管人员，聆讯时，夏否认指控，并透露城管人员在盘问他时对他拳打脚踢，他在自卫下才导致意外发生。不过，法庭未有接纳其辩解，裁定夏死刑。

一月三日，数名周刊的记者利用自己的微博户口抗议广东省宣传部部长庹震干预编辑部。事后，这些户口及信息分别被封锁或删除，随后，约五十名周刊的前雇员联署要求庹震下台。

一月五日晚上，总编辑及副总编辑在报社内召开编委会紧急会议。黄交待事件的发生。虽然，管理层与雇员在会议后似已达成共识，但是，负责周刊微博户口的管理员吴蔚被上级要求交出户口密码。之后，一则澄清的启示立即出现在微博户口，信息指：「网上的谣言非事实。我们抱歉有关错误是编辑失误所致。」信息一出，立即引来记者在微博户口中反驳，更牵起财经版记者进行罢工。

事件发生时，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及《环球时报》持续地透过社论掩饰事件。一月七日，《环球时报》刊登「南方周末：致读者」的文章，文中更称事件得到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支持。文中又谓，所谓的「新闻自由」在现实



《南方都市报》前副社长朱林辞职，尊敬的中纪委领导：本人王文志，现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我以公民的身份实名举报前副社长朱林等高管在收购山西金山资产的百亿并购买中纪委放水，致使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朱林等已构成渎职，并有巨额贪腐之嫌，具体见长微博。

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杂志《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向中纪委实名举报香港上市公司，并主动提交相关的新闻材料，助中纪委调查。（网上图片）

中是无法单独摆脱国家社会政治现实。中宣部立即下令媒体刊载《环球时报》的社论。有媒体听从指示，在翌日的报章中刊登该社论，网络平台包括新浪、腾讯都有刊载，但是，他们在文章的底部列明「不代表本网立场」。

两份报章《新京报》及《潇湘晨报》起初更拒绝刊登该则社论。一月八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严力强往《新京报》的报社要求总编辑戴自更刊登有关社论，但是，戴拒绝。他说，由编辑部员工投票决定，结果是反对转载有关社论。严力强遂恫吓说：「你必须转载，否则解散报社。」该报最终转载，但是，没责任编辑署名。戴期后当着严口头提出请辞，不过，有关辞职未获接受。《潇湘晨报》因拒绝刊载该社论后，被中宣部点名批评。虽然，该报在翌日即九日转载，但是，旁边却放上一则广告，藉此讽刺。

《南方周末》事件引起国际媒体、学者、名人及普通公民关注，他们分别在互联网上张贴留言或自一月七日起，在南方集团大楼前抗议。一月十日，广州公安清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问及有关事件时，她仍旧否认中国有媒体审查。广东省宣传部部长庹震在事件发

生后，仍旧出任部长一职，《南方周末》的总编辑黄灿则获擢升，出任《南方周末》的行政总裁。《南方周末》不少资深的记者相反主动辞职离开。

### 记者为维持生活争取加人工

另一起罢工事件发生在甘肃省《兰州晨报》，因为记者的薪酬极度低微。根据台湾《中央社》五月十八日报道指，甘肃最大纸媒《兰州晨报》众多雇员于五月十六日进行工业行动，有约百名职工要求提高薪金而进行罢工。报道指，记者每月的薪金约二千人民币（约二百美元），不过，记者的每月基本工资只不过是约四百人民币（约五十美元），数目根本难以让记者维持生计。管理层期后答应提高工资，工业行动遂告终止。不过，管理层并无透露提高多少工资。国际记者联合会关注媒体业竞争炽热，以及中国政府鼓励业界进行重整及收购下，誓必令规模较细，以本土新闻为主的媒体难以生存；再者，此环境亦容易让记者有借口收取商界安排的记者会予记者「红封包」的做法。类近的事件便出现在《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身上，他在电视上「认」收钱写稿。

国际记者联合会支持每名记者应取得足够工资，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记者更应有自由为争取福利行使抗争的权利，当中包括罢工权。记者更不应因抗争后而被秋后算账。本会十分相信若记者不能获得合理的工资，容易予人用金钱利诱媒体编辑部放弃编辑独立，甘愿妥协的可能性。自陈永洲事件发生后，媒体界再次讨论中国媒体的道德操守。事实上，中国媒体也有道德操守，不过，政府却不是要求记者聚焦执业操守而是着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理论。

国际记者联合会谴责官员或商界任何试图干预媒体编辑独立的行为。本会要求《南方周末》记者及其它媒体的记者直接拒绝或用任何方法



中国大陆前记者李建军跟王文志一样,公开举报香港上市公司,并飞抵香港向香港廉政公署提供数据。(香港摄影记者)

抵抗官方的指令。本会相信这群记者已向业界作出最勇敢及具责任感的示范,媒体应予以学习。不幸地,官方清楚地没聆听业界的诉求。

国际记者联合会更促请中国落实已签了十五年,但仍未在本国推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保障新闻自由,此权利早已列在中国的宪法之上。同时间,本会亦促请中国全面推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有关公约已于二零零一年落实,记者因而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利包括罢工,争取自身的福利及足够的工资,享受合理的生活水平。同时间,本会促请全国记者协会履行自身的责任,为记者争取权利。

### 记者变成执法者的工具

记者响应中国官方向市民提出互联网上「实名举报」的行动,接连出现主动向中国中央政府或共产党的执法机构提供证据。此趋势令人感到困扰。

七月十七日,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杂志《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透过自己的微博,实名举报香港上市公司华润集团。王指,有关文章早在同月五日已于受雇的杂志刊登,所以,他选择利用微博张贴予中纪委的投诉信,

要求委员会调查有关集团。举报刊登后,华润集团否认指控,不过,香港众多媒体跟进事件后报道指,王述明若官方执法部门要求他提供证据时,他会停止进一步再揭露相关个案的数据,自从举报后,媒体再没有相关王的报道,包括没有中纪委调查该集团的消息。

该集团亦遭多名小股东入禀香港高等法院追究民事责任。八月,一名中国大陆记者李建军更带备大量该集团的资料,由大陆飞抵香港,并向香港的廉政公署举报有关集团。据报,李曾使用自己的微博实名举报有关集团,但是,官方没有理会。本会更获悉一个未能查证的消息指,李事后与妻子离开中国。

在新闻自由的原则下,媒体有责任保护新闻材料,并不是协助执法者履行他们的职责。国际记者联合会认为:「媒体与执法者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各施其职,媒体的责任不能与之混淆。」

虽然,不是所有记者举报后的遭遇跟李建军一样,但是,也不是仍可在稳定的工作岗位里工作。《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于二零一二年举报,中国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贪腐。之后,他承受莫大的压力,一度停用微博。有关报道期后获一个国际组织颁发「清廉奖」。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在德国的颁奖礼上,他发表讲词,他形容中国的政治雾霾跟空气的雾霾一样。他更指,即使中共高级官员,也无法知悉二零一二年发生的薄熙来丑闻事件,因为传统媒体「垄断」信息。他返回杂志社后,十一月下旬突接获上级通知调往集团刚于九月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杂志社集团否认罗被降职,更指有关调配是「正常的岗位调配」。罗昌平于二零一二年在自己的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贪腐、伪造硕士学历及有婚外情。二零一三年五月,刘被撤辞。



维权法律学者许志永及其代表的新公民运动其它成员,因要求政府给予公平的教育权及公开资产后,被北京市政府提出检控。(网上图片)

### 信息即使涉及公共卫生与安全亦被压制

惯常控制信息的做法,在二零一三年仍旧持续发生,即使信息涉及公共卫生及安全。这些信息包括传染病、火灾、性剥削、漏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极具政治影响力之一的前国家安全沙皇周永康的贪腐案。

自三月五日起,中国大陆上海沿江一带河流包括横跨松江区、金山区、闵行区及奉贤区,与浙江省出现多不胜数的猪只尸体在河流上漂浮事件。可是,三月十四日,媒体接获中宣部下达禁令,着媒体报道事件时需引用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而不能有独立采访及评论。官方在事件中,虽然否认在江水样本中找到病毒或有人受感染的事件,不过,有关当局并未有公布是否曾进行彻底调查大量猪只死亡事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章,当局有责任适时向外公布有关动物疫情的信息。

延缓发布H7N9禽流感病毒肆虐的信息,致夺去最少六人的生命。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外公布,有三人分别在上海及安徽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上海的两名患者更告死亡,而安徽的病人情况仍然危殆。之后,在四月二至五日,上海及华东一带再多四名人士被确认受到传染。根据四月八日的报道指,受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的累积个案有廿一起,死亡的个案有六起。在众多个案中,最先死亡的病患者患病时间早在二月十九日出现,三月四日终告不治。可是,有关个案却延至三月三十一日才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外公布。根据《南方都市报》指,首起被确诊的个案在三月四日,但是,上海政府在三月八日却称有关信息是「谣言」。社会质疑当局拖延向外公布消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则解释,有关病毒在中国境内并非纳入法订呈现的个案。不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章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指,部门对社会公民利益有关的信息,及发现有病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必须适时报告。

五月三日,北京市京温商城外安徽籍女子袁利亚离奇死亡事件,公安称袁是从高处堕下自杀身亡。但是,袁的父母怀疑女儿遭多名保安轮奸后被杀致死。五月八日,媒体被指令转载北京市公安局就事件发出的声明,同时间被指令不能采用其它信息源作出报道。所有网络媒体被要求低调报道事件,而社交网络则被要求删除相关信息。

五月十四日,多个媒体揭露多间小学校长卷入风化事件,受害者都是学校的小学生。多名博客发起保护小童权益运动,有关当局则要求媒体低调报道有关性丑闻,并不要报道保护小童的运动。

六月三日,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镇宝源丰禽业发生致命火灾后,中宣部立即下令各媒体报道有关事件时,需转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



中国最高领导层之一的周永康盛传被中央调查后,有关消息迅即引起社会以致国际媒体关注,但是,官方一直未就有关消息作出响应。(网上图片)

道,不能独立采访报道。有关火灾导致一百二十人死亡,七十七人受伤留院。

中宣部向所有媒体下达禁令不能报道,维权法律学者许志永被当局拘捕的消息。代表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在家被软禁三个月后,七月十六日被北京公安正式以扰乱公众秩序为由予以拘捕。许是公盟的创办人,后遭官方指该非牟利组织未获得官方批予牌照而被封;他期后要求官员公开资产。

七月十八日,非官方智库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突遭约二十名北京民政局连同公安搜查办公室。他们指控该组织为非法组织因为没有官方签批的牌照。有关人员同时没收办公室内六百份的宣传品,但是,未有给予任何解释。

英国报章《每日电讯报》十月十日报道,中国前总理李鹏女儿李小琳被卷入协助安排瑞士苏黎世保险一九九五年入股新华人寿买卖的事件。报道指,瑞士苏黎世保险给予1690万美元作为「诚意金」予一名商人,部份款项会作为贿赂官员之用。李小琳及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在十月十三日发声明否认有关指控。不过,报道后李小琳的名字迅即成为敏感词,网民难

以用其名字在网上贴出留言,与此同时,相关的报道亦在网上被删除。

十月廿一日,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在推特刊登一则有关,最高政治领导层之一周永康被中央调查的消息后,电视台随后立即删除并指有关信息「不确」。发言人指,有关户口遭黑客入侵,但未有再进一步解释。周永康的消息,中国媒体虽偶有报道他曾出席一些公众场合外,其它有关他的事均告欠奉,甚至台湾《联合报》十二月二日报道指,周被中纪委扣查的事,均一律在中国境内的媒体上未有报道。有记者向本会表示,即使他获悉大量有关周的消息,但是,由于周永康的事是高度敏感的政治事件,中国媒体一如概往都无法报道或转载其它媒体有关中国领导层的消息。纵使如此,中国媒体却报道了跟周永康密切连系的人士被调查的新闻。周永康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管公、检及法三方面。推特的消息加强助证,中国社会数月间盛传周永康被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调查的消息。该小组由中国主席习近平下令成立,专责调查有关周永康的事包括嫌疑贪腐、滥权、妻子致命交通意外的关连事项及与前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的关系。西方惯用的社交网推特在中国被封,但是,多个官方机构都有开设相关账户,向海外人士传递信息。

省宣传部及商界是最主要封锁新闻报道的源头。十一月廿二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海底油管的漏油事件,导致最少五十二人死亡,一万八千个住户被疏散及众多人仍下落不明的事件。根据《北京青年报》指,意外发生于十一月廿一日半夜,但是,当地政府或涉案的中石化并没有立即公布有关事件。根据香港《明报》指,前赴采访的记者被阻止进入意外地点,及采访习近平探望灾民的现场;同时间,当地媒体更没有利用头版报道有关意外的新闻,引致众多民众质疑媒体是否受到当地政府施压。中石化分别在香港、上海以致纽约均有上市。

# 中国媒体人要组织化抗争，还是体制化生存？

作者：田方

对于中国媒体人而言，2013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以新闻人自主抗争的《南方周末》献词事件开篇，拉开了言论自由整肃的序幕。

南方报业不乏抗争审查制度的“出格”案例，譬如《南方周末》披露希望工程造假、《南方都市报》报道官员掩盖SARS疫情，相应代价就是负责采编的主管被撤换，即便是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的大学生孙志刚之死报道，因得罪了广州市政法系统官员，致使南都总经理喻华锋和总编辑程益中身陷牢狱之灾。

一般而言，类似披露SARS的“出格”报道引发当局惩罚时，作为体制内中国媒体管理层的惯常应对，就是要求员工对外保持一致，换言之，不对外披露消息，包括不接受外媒报道，以免落下勾结外部势力的罪名；其次，体制内抗争的方式也很有限，一般情况下是在报社内部签署陈情书，向总编、社长等报社领导表达一线采编人员的诉求和愿望，不太可能在版面文章或标题上打擦边球表明抗议姿态，更不会集体罢工行动。遗憾的是，当新闻审查黑手伸入编辑部自身时，即便是最勇于报道真相的南方报业人也只能放弃原则，顺从管理层的息事宁人，给当局一个“面子”的姿态。

事实证明，当事件的原委无法在公众层面完整呈现，外部声援力量受到挑战的时候，南方报业内部的采编人员往往也无法获得由上

而下的沟通渠道和说法，这让人很抓狂。虽然，随着新闻人对于微博、微信等新兴社交媒体的运用日渐娴熟，而且屡有组织串联、社会动员的尝试，但维持在体制内的抗争，意义仍然非常有限。

以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为例，南方报业大院的诸多采编人员，对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庾震推行日益严苛的新闻审查发难，契机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非正常编辑流程删改。先是由一些调查记者在微博披露了“删改”一事，继而南方周末的采编跟进讨论，传播很快溢出媒体圈，甚至演艺圈的明星也加入对新闻反抗审查的声援——南方报业的采编在发起三波联署信的时候（联署主体分别是前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南方报业在职采编人员以及公众），谨慎地把目标限定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新上任的省宣部长庾震的审查苛政，亮出“驱庾护宪”的抗争口号。

南周新年献词事件最终能最大限度地在公众层面演变，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动员与声援，给了南方周末编辑部内部抗争很大的动力。然而，当南周新年献词事件成为海内外媒体的焦点，在南方周末编辑部内部的抗争又因循守旧，滑入了传统的程序：对外封口，对内申诉。即便同在南方报业大院任职里的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同僚，他们冒着可能随时被开除的风险，具名签署了“驱庾护宪”公开信，也无法从南方周末的采编同僚获得更多的资讯——即便在他们认为最核心的事实上，宣传部长庾震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篡改了见报的新年献词，谁应该对新年献词文中出现的差错负责。南方周末新闻部的几个核心采编没有办法回答，也不愿意公开站出来指证，因为这可能遭致组织系统的报复；而执行庾震删改指令的南周管理层更不愿意回应，事情陷入了焦灼状态。在一个

非民主政治环境下的体制内抗争，南方编辑部内部的一线采编放弃了直接对外互动，对高层的申诉施压难以奏效，只能蒙受信息蒙蔽，陷入囚徒困境。

而在微博讨论发酵的同时，南方报业大院门外聚集的声援者在积攒力量，先是零星的举牌声援，社交媒体也有动员公众一月七日（第一个工作日）到南方报业聚集——终于在一月六日晚上，南周的高管与一线采编摊牌了，高管希望继续息事宁人的姿态，强行以官方微博名义告示献词“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试图撇清震与事件的关联。

这一番强词夺理的说辞，引起了一线采编反弹，破了他们认知的南方周末职业道德底线，陆续在共同停工的联署信签名了——虽然我接触的好多位采编人员后来流露怨言，私下透露他们并不了解编辑部的抗争过程，以及如何达致停工这一步。公开信回避“罢工”一个词汇，“采编自主权”的抗争基调也不同于公众的“新闻自由”诉求，但也为南周献词事件的新闻人集体抗争做了一个完整的交代。

只是，这一例新闻采编自主的抗争个案，会是南方周末乃至中国媒体人的涅槃再生？情况并不乐观。

南方报业坚持的“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的人道化”等理念，在2008年拉萨骚乱、奥运年遭遇官方“

反普世价值”，而且被毛左分子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而到了2011年初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中文互联网集结的号召此起彼伏，当局则是派遣上百民警和便衣警察，连续三个周末进驻南方大院，防备意外事件；因此，2013年初南方周末献词事件演变到集体“罢工”，无疑挑战了中共十八大的习近平新班子求稳战略，最终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体行动，后果就是南周、南都等“市场导向”的报纸领导层遭遇改组，以党委领导负责制取代了总编负责制——传统上，这几家媒体的在任总编都不是党委负责人，甚至有的高层因为有提拔机会才不得不突击提交入党申请书。这是自由派大本营——南方报业走向体制化生存的一个重要象征。

在“中国梦”复兴的名义之下，官方整肃言论自由仍在继续。在社会矛盾高发期，中共当局愈加充分认识到严密控制舆论之迫切性，遏制新闻人的自主性；而中国新闻人普遍面临严峻的一个选择，是要组织化抗争，还是体制化生存。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上海的两大报业集团行政合并，甚至有传闻当局有意将传统传媒从业者以公务员身份收编……在众多的突围努力中，我们所能看到的积极一面，应该是越来越多中国媒体人投身自媒体写作平台，尝试众筹方式自立，回归一个独立的新闻人立场。祝他们好运！

## 记者因执行采访职务被流氓、公职人员及公安殴打

二零一三年袭击记者的事并未终止，袭击者中更有涉及政府人员或与政府人员有关连的人士。五月廿九日，《陕西科技报》冯姓记者调

查靖边县一起违规建筑楼盘时，因拒绝接受贿款而遭两名男子持刀袭击。记者被袭击时，两名凶手喊着「谁让你多管闲事？」记者指，他被袭击时，正跟当地宣传部副部长在酒店内会面。副部长在事件中并没有受伤，记者则身中七刀。

五月三十日,陕西省国土局局长疑指示多名人士袭击两名《新西部》杂志记者。

根据报道指,记者向有关部门追问渭南市潼关县当地一个违规金矿场事情时,一名自称是局长的男子说:「我们需要给记者汇报吗?我们有权不回答你的问题。你娃今天死在我这里。」当两名记者离开该局时,突遭局长及其它职员阻止包围,一名记者遭局长挥拳袭击头部,其它人事后向该记者拳打脚踢,记者身体多处受伤。

《腾讯网》记者丁森兴及曹起平六月廿八日赴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采访一起强行迁拆的个案时被殴打。据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指,二人拍摄后,被十多名公安及法警殴打。丁更指,当他被公安抬进一部车后再度被殴。二人的脚及颈部都留有瘀伤。

《新京报》七月十八日报道指,《湖南卫视电视台》两名记者采访湖南省临武县贩卖西瓜的农夫疑被当地城管人员打死一案时,遭多名公安持棍袭击。记者李海涛指,他与同事雷凯被至少五名公安持棍殴打全身。他在车上时,公安更持棍伸入车内打他,头部被打了五次。二人事后全身以致头部均告受伤,手提电话被损毁或不翼而飞。李海涛更记得,其中一名公安恐吓他们时扬言:「不要拍,要拍就让你死在这里。」

广州《新快报》九月十一日报道指,该报四名记者在九月十日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调查采访,一乡郊地内疑筑建非法建筑物时,被流氓殴打。报道指,记者发现该地由不知名人士盖有大型的私人会所,并怀疑该会所是非法僭建。记者随后前往镇政府大楼的会议室,准备采访事先答应接受访问的村长。突然间,有一名男子行向记者付玉良跟前,袭击付的鼻。当付前往医院治疗鼻伤时,他与前往医院探望的另

外三名同事在医院内,被六名人士殴打达半小时。受伤记者相信该六名人士跟在镇政府大楼袭击的人是同一帮人。公安事后逮捕了四人。

### 记者被惩罚包括撤职、停职或记者证被取消

众多记者因独立采访报道而被惩罚,包括撤职或停职;亦有媒体因刊登批判性文章致牌照被吊销或取消首轮上市申请。

中共中央党校周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于二月廿七日给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鼓励中国抛弃朝鲜(北韩)后,职务被停止。根据四月二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指,邓接受《朝鲜日报》访问时承认,他的文章在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后,中国外交部曾向其上司投诉。邓在文中罗列五点理据支持中国抛弃朝鲜(北韩),应鼓励及促成韩国统一,倘韩国统一则可减低美、韩及日的联盟机会。他更认为有关做法,可减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压力,又可有助于解决台湾的问题。

属于《财经》杂志集团旗下《Lens》杂志在四月六日期刊中,报道了多名被关在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女士遭劳教所内人员滥用职权虐待后,该杂志的刊号被取消,兼原定六月上市的程序突被阻延。杂志报道后,引起境内多所媒体转载及追访。不过,媒体期后接获不准转载或评论的指令,而当地政府亦为事件成立调查小组调查。事后透过官方媒体公布认为,有关指控不实。可是,有关调查报告内容并没有全部公开。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表示,官方针对该媒体的反应,清楚显示有关行为是间接地打压新闻自由。

另一名记者因不满官媒雇主《中央电视台》处理一名博客的新闻时「未审先判」而辞职。王青雷原是节目《廿四小时》的节目监制,但由于他在微博户口上公开批评《中央电视台》广播美籍华人薛蛮子电视招认嫖妓的处理手法而



被撤职。他在博文中提醒同业, 万勿充作法官或陪审员。十二月二日, 媒体报道王被撤职的消息, 并转载他张贴在微博上的公开信函。王在公开信中表示, 在窒息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扭曲了他, 致他要面对无休止的挣扎及痛苦。他同时引述同事对其离职的感言谓:「过去数十年, 有编辑、记者、监制及导演因为报道被停职, 不过, 你是第一位监制因为说出真感受而被辞退。究竟《中央电视台》近期发生了什么事?」王相信《中央电视台》的举措已传递清楚的信息就是「杀一儆百」及「用他们的方法来束缚人的思想」, 然而, 他相信结果是徒劳。他深信在电视台内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 只不过, 他是唯一敢于发声的人。根据《中国数字时代》指, 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披露, 电视台记者每年接获逾千项的禁令。王于二零一一年浙江省温州两动车相撞事故发生后, 曾质疑铁道部部长为求竖立最快火车之名, 而不顾乘客的安全, 之后被暂停职务。

### 禁制独立报道新疆及西藏

新疆及西藏仍旧防止媒体入内采访, 因而没有独立的报道来自两个自治区。二零一三年, 连串被称「恐怖袭击」事件在新疆发生, 不过, 外界极度困难知悉事件发生的细节。整年间, 外界亦同样难于取得西藏的独立信息。

四月廿三日, 新疆发生致死的所谓「恐怖袭击」事件, 导致廿一人死亡。社会摘取此重大关注的事件的消息极为有限, 因为政府严谨控制信息发放。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及《环球时报》指, 在三个族裔区域中有十五名市民及公安被杀, 公安同时间亦击毙六名被指是恐怖份子的袭击者。四月三十日, 新疆公安称在喀什、乌鲁木齐及蒙古的巴音楞拘捕十九名嫌疑犯。公安指, 有关恐怖组织于二零一二年九月成立, 并准备在夏季于喀什人多的地方「做大事」。意外发生时, 公安声称组织在制造炸

弹。然而, 所有消息都是当地政府单方面发放, 媒体并未能进行事实核查。一名中国境内媒体记者指, 境内媒体对西藏、新疆及蒙古发生的事都是完全依赖官方信息, 倘媒体寻求其它消息来源, 便很容易被指控「分裂」国家的罪名。二〇〇八年, 记者长平便因在海外媒体的网站上, 撰写同年在西藏发生的骚乱事件而被撤职。

随着新疆二〇〇九年七月五日汉维两族发生暴力事件踏入四周年之际, 六月廿六日起, 新疆内陆接连发生暴力事件。但是, 实际的死伤人数以致事件发生的源由, 中国境内媒体并未向公众交待。根据新疆境内多份媒体报道, 新疆政府已将连串发生的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但是, 有关当局并未有提供证据引证。事件发生后, 只有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媒体报道事件, 当网络平台腾讯及新浪引述有关英文报道时, 信息很快便被删除。根据《英国国家广播电视台》及《法新社》报道指, 记者被阻止进入涉事地区之余, 公安更充公记者的相机。

首起公开报道的暴力事件发生在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镇。据报道指, 有三十五人死亡。两天后, 和田罕尔日克镇及墨玉县先后发生暴力事件。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姐妹报《环球时报》报道指, 有百名维族人士在“起教场地集结”后冲击派出所, 引致众多受伤。不过, 报道未有交待促致冲击的原因。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谓, 袭击源于当区一名伊斯兰的牧者被迫在其祷文中要“与政治思想统一”引致公安突袭清真寺, 引发数以百计的维族人上街抗议。报道指, 普通民众及公安在事件中均告死伤。另一场暴力事件则发生在乌鲁木齐市赛马场, 据《环球时报》报道指, 「二百人企图煽动麻烦」, 但是, 同样未有进一步揭露导致原因。



所有新疆的媒体都是刊登宣传部发出的信息, 引致新疆的媒体难于取得社会的公信。(网上图片)

据众多海外媒体报道指, 新疆政府在事件发生后, 已开展拘捕及审问数以百计的维族人。据新疆政府官方网站《天山网》指, 新疆昌吉州公安已惩处26人指其制造传播谣言。但罚则却未有清晰交待。在连串冲突事件发生后, 所有网上联络工具如QQ、微信及微博都受到公安严密监控。公安及武警日夜在街上及学校区驻守巡逻。国际记者联会相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施行的严控管制已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及摘取信息的权利, 这些权利本受到中国相关法例保障。众多普通的维族人士都感到沮丧, 因为他们自觉没有表达的权利, 更因自身的小数族裔身份而被卷标为「恐怖份子」。

十月廿八日天安门外发生汽车撞死五人及多人受伤事件。事件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近故宫处的金水桥。事发时, 一辆吉普车撞向金水桥导致五人死亡及三十八人包括旅客当场受伤。意

外后, 多名记者包括《英国国家广播电视台》、《法新社》、《香港电台》、《香港商业电台》、《香港无线电视台》及《香港有线电视》记者赶赴采访。但却遭公安阻挡及扣留。两名《法新社》的记者更被公安强行删除照片。多名外国记者更发现互联网的网络速度突然减慢。一名外国记者说: 「意外后, 我由下午三时开始发放一个档案。但是, 到当天午夜时份仍未能成功发送。此非常情况下, 我知道有多名记者需要用其它途径发送信息。」再者, 所有大陆媒体在意外发生后便接获官方的指令。据香港《明报》报道指, 大陆媒体只能刊载官媒《新华社》, 并且不能把相关报道成为报纸及网页的头条, 网上相关评论和跟帖, 必须紧贴监控, 一旦发现有敏感消息必须删除。北京公安于意外后, 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但未有交待相关的证据。十一月廿四日, 《路透社》报道指, 东突伊斯兰组织已承认袭击事件。

十一月十五日, 所有媒体报道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一月九至十二日会议后宣布, 将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并会进一步收紧互联网的信息, 确保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在这政治环境下, 中央政府增强新科技监控通讯工具的能力, 众多报道指, 此力量的提升目标是指向新疆及西藏地区。

十一月廿一日,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一名负责新科技发展的清华大学教授指, 「在我们的技术协助下, 他们可以取得第一手, 实时的情报信息」。该名教授更谓, 该技术可以翻译多个主要小数族裔的语言, 同时间亦可以翻译海外多国语言如日语及阿拉伯语, 监察系统更可能可以辨识警号, 特别是信息附载在图片上, 该教授指, 「互联网上越来越多信息是以图片传送, 以避过政府的监察, 现时很多的工具并未监察到。」

# 驻华外国记者 篇

代表外国媒体的驻华外国记者持续地面对困难境况,尤其是工作签证被拖延或拒绝。报道中国新闻达十八年之久的资深记者疑被政治审查,致未能成功取得工作签证。同时间,有电视台摄制队在报道城市化的专题时遭到致命的威胁。令人更感困扰的是,一名外国记者即使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竟仍被中国的官员成功「追踪」行踪。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中国公安于二零一三年七月突通知指,外国记者申请工作签证时,公安核查的工作天会较以往长,由过去的五天增加至十五个工作日才决定是否更新其工作签证。不过,公安并未有承诺所有工作签证的申请均获批准。鉴于有关改变,新闻界普遍地深信中国官方针对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的记者,因为该报自先后报道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及其女儿温如春的新闻后,记者申请工作签证均有被拖延的实例。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执委会已就工作签证问题跟中国公安洽商,但是,努力并未能取得成果。协会指,由于签证工作程序延长,引致众多记者未能在圣诞节或新年期间在中国境内旅游,以便等待工作签证及记者证。

海外媒体《博讯》的记者王宁在七月十日返回内蒙古故乡探望亲人时,被迫离开。早年已移民纽西兰的王称,他曾向中国领事馆申请护照达十八次之多,但是,没有一次获得当局批签。二零一三年七月,他终成功返回家乡内蒙古探望病重的双亲。不过,他最终只能停留三天。七月十日,公安前赴他家将其带走扣查问话数

小时。七月十六日,他更被广州的公安监视挟持下登上前赴纽西兰的飞机。王相信,他被驱赶离境跟他过去多番报道中国违反人权的新闻有关,因而触怒中国中央政府。他指,在盘问期间,他被剥夺法律保障的权利及与外界接触。

采访中国新闻十八年之久的美籍资深记者Paul Mooney向中国政府申请工作签证时,却遭中国官方拒绝签发。十一月八日,Mooney接获其新任雇主《路透社》电话通知指,其工作签证遭中国官方拒绝,但是,官方未有给予原因解释。Mooney指四月时,曾向中国驻旧金山的领事馆申请工作签证,期后,领事馆职员在领事馆内跟他面谈。屡获人权新闻奖的Mooney指,在会谈过程中,领事馆职员查问他过去的新闻报道内容,并问他有关人权、维权失明律师陈光诚的问题等,即被形容为「西方媒体偏见」的问题。在会谈尾声,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指,官方威吓Mooney「我们若批工作签证给你,我们希望你以后的报道能够更平衡。」Mooney相信该名领事馆职员跟他见面前,已调查过他因为该职员对其采访报道了如指掌。

国际记者联合会难以理解中国官方何以突然间拖延记者的工作签证批发,又未有给予任何解释,同时间,并不准许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行动享受他们的假期。行动自由的限制也是一种剥夺人的休息权。本会更感到沮丧的是,中国官方拒绝签批一名一直奉公守法的记者的工作签证兼未予解释。这决定更是该记者被查问多项个人的政治意向后才作出。同时间,一些媒体机构因报道了有关中国官方所谓的负面新闻后,似成为攻击的对象。这些事例的出现都清楚证明,中国签批记者工作签证时,不是依从相关法例考虑,而是进行政治审查。

二零一三年元旦前夕,《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Christopher Buckley与家人前赴香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并没有签批其工作签证,即使他

的工作签证申请已有七个月之久。社会普遍怀疑Buckley的工作签证不获官方签批是一桩报复行为,因为该报揭露了温家宝与中国最巨型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的关系。该报驻京主任Philip Pan跟Buckley的遭遇也差不多,潘因出版《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当中描述中国增加出现不公平现象的书,而导致工作签证申请长达十八个月之久,迄今仍未获批签证的事实。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向会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二百三十二名会员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记者认为,中国的采访环境并不符合国际标准,另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二零一三年的中国采访环境较二零一二年差不多或更恶劣。协会又纪录了六十三起公安或不知名人士妨碍记者履行采访工作的个案,当中包括九起涉及记者被人粗暴地带走或遭武力对待。虽然,是类个案较过去减少,但是,使用暴力的方法是绝不能

接受。协会非常关注政府针对外国记者的报复行为。这些行为的出现往往是记者报道了令官方感到冒犯的事后发生。记者遭袭击、网络攻击、持续限制前赴藏民区域、被访者与中国籍的助理被威吓等仍旧发生。

有些滋扰更是对生命作出威胁。二月廿七日,德国媒体ARD的记者Christine Adelhardt及四名摄制队同事在河北省廊坊区三河市大闫各庄拍摄该区城市化的影片。Adelhardt说:「我们拍摄一个村落,那里你仍可见到旧式的农民家庭的房子,旁边却筑起了新盖的房子,背后是一座高楼大厦。」突然间,有一辆车驶向他们,该车的司机更开始用摄录机拍摄电视摄制队。他们期后被驱赶离开,当他们驾车离开时,却被四部车随后追,其中一部车更刻意撞向摄制队的车迫使停车。五至六名身份不名的人士立即落车用棒球棍敲打挡风玻璃。当时,刚好有两名骑电单的公安驶致,摄制队立即呼喊求助,但



德国媒体ARD摄制队在河北省采访村落城镇化后,遭不知名人士袭击致车辆严重损毁。(记者提供)

是,那些不知名人士竟漠视公安的阻止,仍旧用棒敲打车辆的挡风玻璃。Adelhardt指,一名当地人跟她讲,认出其中一部追截他们的车辆属于该村的村委书记。

十月廿八日,一起被形容为恐怖袭击的事件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外。一部吉普车撞向紫禁城外的金水桥后,发生爆炸,导致五人死亡三十八人受伤,当中包括游客。意外发生后,众多记者包括《英国广播公司》、《法新社》、《香港电台》、《香港商业电台》、《香港无线电视台》及《香港有线电视台》赶赴采访却遭公安阻截拘留。

两名《法新社》的摄影及录像记者即使踏着滑行车在天安门外单车径上经过,亦被公安强行截停。当他们被逮着但仍向着前移动时,立即遭十至十五名公安趋前包围。约八名公安强行限制他们的行动,并试图从他们的相机中取出记忆卡。但是,记者并没放手,直至左手受伤后,公安才成功取走该记忆卡。公安之后便把两名记者驱赶到一部警车并驶往紫禁城内。公安在那里取走记者的证件、电话及其它对象进行检查。当记者追问自己是否被拘留及何时可获释放时,公安只以「不」作出回应,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解释。

翌日,另一名摄影记者继续履行职务前赴天安门外意外现象采访,不过,该名摄影记者却被公安扣留达半句钟,相机内的影像更被删除。该名摄影记者被指违反规则,因为记者进入广场时需要预先申请许可证。不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从没听闻有关要求;此外,众多外国记者在撞车意外发生后,发现互联网的传送速度急速放缓。一名记者对本会谓:「我原本在中午三时发一个档案,但是,有关档案直至半夜仍未成功发送。我知道有不少记者在这不寻常的情况下,会使用其它渠道发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致命袭击意外事件,记者的采访工作同样被阻碍。随着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四年前发生冲突的纪念日来临之际,六月廿六日起便发生连串袭击事件,但是,真实的死伤人数以致导致袭击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中国媒体并未能确认。根据新疆的报章媒体报道指,新疆政府已把多起袭击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有关意外发生后,除《新华社》的英语版作出报道,其它媒体并没有报道事件。根据《英国广播电台》及《法新社》报道谓,记者尝试进入意外发生地点,但公安阻截,相机更被公安没收。

首起意外发生在吐鲁番区鄯善县鲁克沁镇,意外中有三十五人被杀。两天后,第二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和田区墨玉县喀瓦克乡,根据《环球时报》报道指一百名维吾尔人在「当地起教会场聚会」后袭击公安局,导致死伤枕籍,不过,报道并没有报道导致袭击事件的原因。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袭击缘于一名教士在聚会中被强行在讲道中要「与政治思想统一」,引致当地的清真寺被公安突击,遂激发起数以百计的维吾尔人到街上抗议。该报道指,众多平民及公安在事件中被杀及袭击受伤。另一起袭击事件则发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赛马场,根据《环球时报》报道指,有二百人「企图煽动麻烦」,不过,报道同样未有交待导致事件的原因。

在连串事件发生后,一名德国记者及其中国籍助理前赴喀什市采访报道事件,但是,当他们抵达当地的翌日,当他们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下榻后,三名维吾尔族人突然间在他们的房门外,定时出现及巡逻。当记者向他们查询是否公安局派遣而来,三人走近该名记者,彼此相距只约五厘米,然后作出睨视及威吓的姿态,但拒予作出任何回应。当晚,记者房间内的电话彻夜响起,遭来历不明的人滋扰,在其中一个的滋扰电话中传来一名男子操着很重维吾尔口音

的声音,他问中国籍的女助理记者是否已婚及其它侮辱性的提问。此外,记者们的房门由凌晨三时至五时便不断遭人持续地敲打,并装作意图用武力开启房门。当记者向酒店的前台投诉时,职员却称从闭路电视中看,未见有人走近他们的房门。不过,记者并不相信职员的说话,深信职员已配合公安的行动,故于翌日退房离开。

类似的个案发生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德国记者Bernhard Zand及其助理在贵州省贵阳市毕节市调查采访当地5名男童十一月时,在垃圾箱内疑烧垃圾取暖,导致吸入一氧化碳死亡的事件。十二月廿九日,二人晚膳后返回位于贵阳市的Kempinski酒店房间,在德国媒体《Der Spiegel》工作的Bernhard Zand发现放在房间内的手提电脑及智能手机被人擅闯房内放在水中。

另一起事件同样发生在新疆和田市。一名欧洲的记者因在公众地方拍摄妇女们舞蹈的照片,而遭公安强行要他删除。他解释,遵从公安的指示删除相片是因为公安跟他说:「删相或是逮捕。」

至于西藏自治区,虽然,没有独立的外国记者可以获得当地自治政府批予许可证进入当地,但是,一个由中国外交部特别安排予外国记者的团,却成功让部份的外国记者进入西藏。据报指,获邀前赴的外国记者都不是驻华的外国记者。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任职于法国电视台《法国廿四》的记者Pierre Vaireaux较早时采访西藏,并于五月三十日在电视台播放有关纪录片。之后,他遭中国驻法国巴黎及泰国的外交官员滋扰。报道指,驻巴黎大使馆的中国官员看罢报道后,致电该台负责人并指报道不准确,要求从网上撤除有关节目,同时间

要求与记者会面。当该名官员获悉记者正身处泰国曼谷后,记者在曼谷突接获驻曼谷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来电,要求他前往大使馆见面。当Pierre Vaireaux拒绝后,他接获多个不知名的电话及短讯。六月十日,他更接获最后通牒着他前往大使馆解释如何取得签证到西藏拉萨的事。

此事件响应独立监察新闻及表达自由的美国非牟利团体《自由之家》一份特别报告指,中国官方的干预已延伸到位于海外的媒体,并以各种的方法干预媒体的编辑独立。该报告指,一所提供卫星服务的法国公司终止提供卫星服务予一所海外的中国电视台,因为要「向中国政府显示良好的姿态」。一名台湾清谈节目主持人因电视台行政高层试图阻止他,在节目中讨论北京视为敏感的题目后,他毅然辞职。在众多事例中,中国官员都是以较含蓄的手段诱使媒体进行自我审查或导致媒体雇主、广告商及其它国际社会作出同样的行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官员会促请高级的行政人员更改报道的内容,及强迫商人不予广告中国不喜欢的中文媒体。更含蓄的方法是,用众多政治及经济作为诱因,使媒体雇主及记者避免涉及藏民、维吾尔人及法轮功学员的议题。

中国官方的施压表面上已见成效。根据《金融时报》十一月十一日的报道指,《彭博通讯社》的总编辑Matthew Winkler撤回一则调查报道,因为深恐有关报道会影响该通讯社在中国的处境。有关报道其实早在九月中,已由位于美国总部的多名编辑仔细省阅,其中一名编辑看罢更以「出色」形容该则调查报道。约一个月后,管理层突决定将该报道抽起「备用」,却未有解释原因。

《金融时报》十月廿九日报道指,总编辑Matthew Winkler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跟记者表示,若刊载有关报道可能会影响该通讯社



《彭博社》自揭露习近平的近亲拥有巨大的资产后，遭中国当局连串滋扰，同时《彭博社》又被指自我审查。（网上图片）

在中国的处境。《彭博》事后否认有自我审查。Winkler向《金融时报》更谓：「我看该报道时，该报道并未准备刊载。」不过，他并未有进一步解释该报道尚欠什么，致未能刊载，兼回避记者追问《彭博》是否害怕刊载后会影响到在中国的位置。《金融时报》指，有关调查报道涉及地产商大连万达集团的创办人王健林跟中国官场高层的家族有关。二零一三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名榜上，王健林位列其中，资产更被指达一百四十一亿美元。十一月十四日，有媒体报道指，《彭博》驻港的记者Michael Forsythe离开，因为他被指向外泄漏「自我审查」的消息。

不幸的是，发生在《彭博》之上的事并未停止。十二月二日，驻英的《彭博》记者Robert Hutton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及英国首相卡梅伦召开联合记者会前数分钟，突被中国政府人员以「不合适」为由要求离开。中国官方翌日否认针对Hutton，并指是因场地「有限」所致。英国首相卡梅伦获悉记者被赶离场后，已向中国表达关注。翌日，《财富杂志》报道指，中国官

员于十一月下旬曾突然「检查」《彭博》在北京及上海的办公室，期间，有中国官员要求《彭博》就总编辑Winkler曾发表的一番话作出道歉，因为Winkler被媒体追问自我审查的事件时，曾把中国政府跟纳粹德国政府进行比较进行自我辩护。

《彭博》自二零一二年报道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家族拥有数以亿计美元的资产后，其官方网站便立即在中国境内被屏蔽直至现在。即使有此遭遇，本会认为也不应影响管理层为求自身的利益而违反新闻自由的原则。

压力同样落在日本的媒体身上。一名忧虑披露所属机构名字后会遭到报复的日本媒体职员向本会透露，该机构报道了中国的审查制度后，中国官员没有任何原因下，前赴他们位于北京及广州的办公室作出威吓。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指，至少有两起事件即中国驻外国的领事馆人员曾接触外国媒体的总部及投诉。驻华的记者报道称，要求他们从网上删除有关报道，及建议他们多做中国的正面报道。国际记者联会对中国官员进入媒体机构办公室，兼直接向外国政府投诉媒体作出负面的报道的合法性表示极度关注。中国官员作出上述种种的行为明显是践踏新闻自由，图达致媒体出现寒蝉效应。国际记者联合会指：「中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员会委员，有责任高举履行国际人权公约。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基石，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威吓都不能容许。」

中国境内发生互联网攻击事件，亦是常见问题之一。至少三所知名的美国媒体指控遭中国黑客入侵攻击计算机系统。《纽约时报》揭露了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家族拥有丰厚的资产后，该报于一月三十日报道指，集团的计算机系统曾遭中国的黑客至少攻击四个月之久。报道指，攻击的时间刚好是揭露了温家宝家族拥有巨型资产后发生。为此，该集团委聘一名网络

安全专家调查,发现负责撰写该报道的驻上海办公室主任David Barboza及驻京前主任Jim Yardley的电邮信箱遭到攻击入侵。

《纽约时报》指黑客攻击对象是曾撰写中国领导层、政治及司法议题的记者,当中包括曾撰

写《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中兴通讯有限公司》的记者。美国政府指控上述两所公司涉及间谍活动,不过,却未有具体证据证明。自《纽约时报》揭曾被黑客入侵后,《华尔街日报》、《彭博》及《推特》都先后公开承认曾遭中国黑客入侵。



# 互联网篇

在媒体界里,互联网已成为最主要的发展媒介,因此,众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想方法加强限制。二零一三年,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可谓进入“冷冻状态”因为政府机构加强合作遏止网上的言论自由。与此同时,公安利用法律使其可在毋须法庭审讯下,以各种不同罪名拘押博客。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重新的演绎,使经常浏览及张贴博文的行为有可能变成刑事罪行。官方又使互联网的服务供货商互相合作,签订一纸以稳定社会为原则的自我约束约章。此情况下,数以千计的网站被封,数以百万计的贴文被删除,及数以千计的博客被公安威吓、拘押及逮捕。这些重大的改变是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及中共总书记后,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议决的。在七名常委中,拥有多年控制媒体历史的前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是其中一员。

十一月十五日,被视为勾勒出全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会议——中共三中全会——决议加强互联网的控制。习近平在演词中说:「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所以,他认为官方一定要「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及信息安全,网络及信息牵涉到国家和社会稳定,是中国面临新的综合性挑战。」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急速。二零一三年十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订期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的会议上,中国报称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中国的网民已达五亿六千四百万,当中有三亿九百万人使用社交网。不过,这数字到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再戏剧性急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指,二零一三年底,中国的网民已达六亿,即显示单是二零一三年起,已有二千六百万网民增加。流动手提电话网络使用者亦有显

著增幅,有百分之七十即约四亿六千四百万人会用手提电话上网。微博及微信的社交通讯工具更令习近平极度关注,因为这些工具「影响大、覆盖广及社会动员能力强」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他说:「面对这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习近平于八月十九日出席负责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党员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他亦作出类似的讲话。在会议上,习指互联网对执政党及国家的未来造成威胁。他批评有人散播谣言,尤其是知名的网民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作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所以,他说互联网应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并谓:「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晴朗起来。」

虽然,习近平在八月十九日说这番话,但是,打压互联网的工作早已开始,只不过,使用的办法有改变而已。起初,官方仍以「打击淫秽及非法刊物」为借口「清洗」所有不能接受的信息、书本及网络信息。

一月四日,官媒《新华社》报称,没收了四千五百万非法刊物,及删除了逾三百七十万条网络信息因为内容被指含有淫秽或非法内容。负责行动是「打击反非扫黄」办公室,当中包括监控媒体的多个政府部门。报道又指,有一万五千起个案已转介法院处理。在其中一起个案里,被判十年监禁的男子被指在新疆和田出售非法刊物;在另一起个案里,两名男子则被裁定出版及销售盗版刊物而被分别判入狱三十六个月及四十个月。不过,有关办公室并没详细交待刊物的内容。

据《新华社》四月十六日及五月三日的报道指,跨越廿个省,接近三百个的网站被指含有淫秽内容,其中有廿个网站被下令封锁。同时间,公安以「散播谣言」为据指控网民。

两名贵州省的网民被指控散播谣言称, 贵阳出现H7N9禽流感, 他们毋须经法庭聆讯下, 被行政拘留五及十日。全国至少有十一名人士被公安指散播禽流感的「谣言」而被拘留, 有廿个微博户被封。

三月, 中国政府重整部门架构, 将负责媒体的两个部门合组, 成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此变动响应习近平曾指「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 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

自总局成立后, 一百零七个网站被指, 没有牌照、或用负面报道恐吓勒索企业或个人而被强制关闭。不过, 这些网站也包括一些新闻网站如《多维新闻网》, 该网站甚受欢迎人经常提供多元信息。

总局又发出通知予所有互联网的媒体, 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在操作网络时, 必须要保持「正确引导」舆论。他们被要求跟从传统媒体、博客客户及微博的做法, 肩负舆论引导的角色, 并主动拒绝散播有害或非法的信息。

五月, 国务院辖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展开打击谣言行动。办公室迫使北京廿六所互联网服务供货商建立一个网上平台让公众举报谣言。三周后, 一个网上打击谣言的平台建立了。北京市宣传部旗下的《千龙网》负责提供信息予该平台。事实上, 众多网民自官方五月公布有关计划后, 陆续遭公安指控张贴或散播谣言, 危害公众秩序而被惩处。微博户拥有四十六万个粉丝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被指控散播谣言, 其微博户口被强制停用。另一个知名例子是中国前卫歌手吴虹飞因七月廿一日在微博上张贴她要「炸」北京建委及居委会, 而被公安拘押十日。吴保释后跟媒体表示, 她在微博上留言时, 自己根本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自那时起, 多名网上评论员及学者都质疑公安及相关的政府部门针对知名的博客, 目的是使他们在互联网上灭声。由于官方向所有互联网供货商施压监控社交网, 互联网遂推行实名制, 要求所有博客必须用自己的真实名字登记开启微博户口。此举能使有关部门追踪被指在网络散播「谣言」的当事人。正因为实名制, 促使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极为出名, 拥有数以千计的粉丝。据报有一千九百名博客拥有逾十万名的粉丝, 而拥有逾一百万名粉丝的博客也有三千三百人; 过千万粉丝量的博客有三百人。

自官方推出「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后, 公安通常以散播谣言, 或散播不实消息影响社会秩序作为指控。公安可据《行政处罚法》拘押任何被视为违反规则的人士, 被拘押者在毋须经法律程序下失去数天至数周的人身自由。

同时间, 官方又要求所有民间组织订定网络自律约章, 删除所有「谣言」。这些公司都是支持官方推出的打击谣言行动, 更有机会获得奖金十万元人民币(约美金一万三千元)。七月廿六日, 北京廿六个网站便自组打击谣言的平台。

八月十日, 北京民政局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网上名人社会责任」论坛, 出席的民间组织有来自中国及台湾。五天的会议后, 一致达成「七条底线」的原则, 这些底线包括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数天后, 北京、山西及杭州公安部便声称接获众多投诉而向多个网站展开调查。「七条底线」的政策导致大量博客被拘押而网站则被封锁。

众多维权人士指控公安滥用权力, 错误使用法律拘押博客或网民。众多律师亦质疑网上留言

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一起个案显示社会失去秩序跟网上留言有关。公安之后改用其它控罪如刑事诽谤或非法营运拘押人。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周强指网上留言浏览五千次或转发五百次有可能会被惩罚。(网上图片)

九月,最高法院向下级法院发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任何人若在网上张贴被指为诽谤性的评论,而该言论又被广泛地转载时,便有可能面对最高监禁期三年的刑罚。解释指,任何人张贴谣言而该谣言被人浏览逾五千次或被转发五百次便会被指控诽谤罪。

十一月十三日,《北京青年报》指,《新浪网》承认有十万个微博户口因「七条底线」而被短暂或长期封锁。十万个户口中,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网上留言是涉及到人身攻击,只有一千零三十个微博涉及散播不实信息。户口持有人被禁止使用户口由五至十日不等,又或被阻张贴留言或阻粉丝跟随。最差的情况是,有户口被永久封锁,不过,报道并未交待相关数目。有关数字的公布只反映一所网站,其它的同类公司并没有公布相关的数据。

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舆论监督办公室公布指,二零一三年八月及九月知名博客的网上留

言数量均较二零一二年同期下跌。八月份,两年相差百分之廿四;而九月份则相差百分之十左右。

国际记者联合会相信此行动中,有数以千计的博主、维权人士及记者被拘押,数以万计的网站被封及数以百万计的留言被删除。重庆便发生一名初中生因质疑一起交通意外事件,而被公安拘押数天的惩处。

二零一三年,中国的审查制度踏入一个新的篇章,负责筛选网上留言的工作竟可成为一项专业,获得官方颁发证书。九月,《新京报》报道指,《人民日报》将提供培训课程予负责筛审网上言论的人,课程修完后,各人若通过考试便可获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签发证书。报道又指,现时估计负责筛审六亿网民的人员有约二百万。

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后,政府或个人网络攻击遂成二零一三年的热门话题。中国官方否认参予类似的国际性网络攻击,并不断称中国在网络攻击中是受害者,而不是攻击者。不过,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二月的报道指,位于上海浦东解放军总部61398部队的附近一栋12层高白色办公楼便是中国黑客的基地。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公司Mandiant指,众多美国计算机攻击的受害者受到代号“注释组”或“上海帮”攻击。但是,报道未有解释何以众多攻击只源自于一个相对细少的地方。

三中全会后,官方立即下令镇压网络,众多在大型媒体企业工作的记者接获上级的指令,要求他们立即停用微信。有记者对本会表示,上级领导要求他立即停用「微信」因为他受雇于媒体机构,若使用微信传播信息时便会出现「利益冲突」。该领导承认,停用的指令来自企业



中共三中全会后,经常使用微信的记者被要求停止使用,否则要求辞职。(网上图片)

的管理层及外界的压力,但是,该领导并没有进一步诠释「外界」的意思。该名记者相信指令来自于官方因为众多使用微信的记者都接获类

似的警告。他又谓,若拒绝听从指令,便会被要求辞职。另一名记者则被要求停止运作所有网上的组群。

官方能够验证使用微信表达意见及分享信息的记者身份,缘于多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已透过工具,检出微信活跃户的身份,协助官方可向个别用户作出箝制。微信类似中国境外WhatsApp的通讯工具,它既可秒速传递文字信息之余,亦可传递声音档案。

# 香港篇

根据香港称为小宪法的《基本法》第廿七条说明，香港享有言论、新闻及出版自由，不过，这些自由在二零一三年却明显受到损毁。自二零一二年香港选出新一任的行政长官后，记者或公众遭警察的阻挡及攻击明显增加。二零一三年，此情况更见恶化，媒体不单承受来自政府机构的压力，亦有来自私人企业及其它国家的机构。

在众多引起关注的事件中，包括香港特首要求一份报章撤回批评他的一则文章、负责打击

贪污的香港廉政公署用法律迫使媒体机构交出专访的新闻材料、警察针对执行职务的记者又未有保护他们免受公众暴力对待、记者在摘取信息方面越加困难、政府部门又更改官方网上已公开的信息、广受社会欢迎的收费电视台疑因政治原因导致失落于免费电视牌照的申请，引起社会极大愤怒。香港记者在采访国际的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向菲律宾总统提问后被指「不尊重礼仪」而驱逐离场，及香港记者持续在中国大陆采访时被袭击。

香港媒体自我审查仍然严重。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十一月的调查显示，香港人满意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在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摄影记者执行职务时遇到群众的恫吓已成为寻常事。(明报提供)

间,有显著的下坠。超过一半的被访者指相信香港的媒体在报道中央政府的新闻时,有自我审查;有百分之三十四的被访者相信媒体在报道香港政府的事上,有自我审查。研究计划总监锺庭耀指,社会大众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满意程度及对媒体的公信力都跌至香港一九九七年回归中国大陆时的新低。

### 期望依法治港竟沦为以法治港

二零一二年七月起,梁振英出任香港新一届的特首。自始,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中心就梁个人的民望以致领导团队的表现进行定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出现旋转式的下坠。



正当香港特首梁振英管治表现出现旋转式的下坠之际,梁就一名政治评论员的撰文,威吓提出法律诉讼。(明报提供)

梁振英其实明白当其要求《信报》撤回有关政治评论员的文章后,香港的新闻自由会受到考验。二零一三年一月廿九日,前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练乙铮基于前全国政协刘梦态接受《阳光时报》杂志的专访后,在香港《信报》撰写文章质疑梁振英可能跟黑社会有联系,梁振英遂向《信报》发律师信要求撤回该篇文章。

《信报》于二月五日作出道歉,但是,总编辑陈景祥强调有关致歉是向读者,并拒予撤回有关

文章。道歉声明刊登后,梁予以接纳。不过,该则声明换来媒体界、人权捍卫者及泛民主派的议员表达愤怒。梁振英在竞逐特首时,刘梦态是其支持者。

针对媒体的报道持续发生。八月七日,香港廉政公署(又称廉署)向香港高等法院入禀要求,香港《商业电台》及现已改为网上杂志的《阳光时务》交出采访前全国政协刘梦态的新闻原材料。有关专访分别在一月廿四及廿五日发表。根据多份香港媒体的报道指,廉署五月时已要求香港《商业电台》交出相关的原材料,但被拒绝。九月五日,香港高等法院撤回廉署要求《商业电台》的申请。十月九日,廉署就《阳光时务》的申请自行撤回,法院随即下令廉署承担讼费。



香港廉政公署意图利用法律迫使,两所媒体机构交出采访前全国政协刘梦熊披露特首梁振英秘密的原材料。(明报提供)

在聆讯中,《阳光时务》辩护律师指廉署并没解释索取新闻原材料的原因。法官在聆讯中亦重复表示,廉署必须要平衡执法与香港的新闻自由。国际记者联合会会员的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学者及立法会议员都高喊反对廉署的做法,指斥有关做法明显践踏香港的新闻自由。

国际记者联合会非常担忧香港的执法部门采纳了中国大陆公安的手法,在未经合理的程序下迫使记者给予口供。事实上,欧洲人权法院已有大量相关案例显示保护新闻材料是新闻自由的基石。其中一起近期显示相关原则的案例便是《马田及其它对法国》。本会认为,所有香港的媒体企业持有人一定要坚持,及向所有试图滥用权力的执法人员说「不」,必须要捍卫记者履行职务,报道公众利益有关的新闻事实。

### 目标媒体

香港警察向新闻工作者施压之余,又未有阻止公众向记者作出的犯罪行为。八月四日,《壹周刊》罗国辉及《明报》记者邓起弘在旺角采访拍摄两群体抗议时对垒的情况,遭多人以粗言秽语谩骂、阻挡拍摄及袭击。罗至少三次被推倒在地上,当邓获悉有人被推,遂趋前拍摄,亦同遭多人阻挠及用脚踢他。身兼香港摄影记者协会执委之一的邓起弘指,他们担心类似的事件往后仍会发生。他说:「我们只想报道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希望每名市民在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利时,同样顾及别人的安全。」香港记者协会新闻自由小组召集人雷子乐指,香港警方在事件发生时,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袭击记者的行为。十月,香港警方称拘捕及检控一名退休警员在事件中涉嫌犯普通袭击罪。

九月十五日,特首梁振英第三度到小区会堂见公众,吸引约百名支持者在位于湾仔的小区会堂外集结。多名摄影记者投诉指,当他们拍摄



《壹周刊》及《明报》摄影记者采访一起群众集结的事件时,遭四周的群众威吓,图中男子被指是袭击者之一。(明报提供)

这群支持者时,被他们语言攻击。他们向警察投诉,警方却未有解决相关误会,相反,把记者围堵阻止他们拍摄。

九月十三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潘敏琦撤回律政司上诉原审裁判官,十二月释放前摄影记者成启聪时,她指,律政司对原审裁判官的裁决基于臆测,更指律政司对前摄影记者的追究「矫枉过正、吹毛求疵」。成期后接受《商业电台》访问,他透露事件发生后,香港警方曾要求他向保安员及香港警方道歉,原因是其雇主《苹果日报》对香港警方有偏见。

### 媒体拥有人及广告商遭袭击及恫吓

香港的媒体拥有人及机构连番遭到攻击。五月三十一日清早时份,《大纪元》向本会投诉指遭两名男子损毁该机构办公室的玻璃门口,而意外发生前,该机构在中环及湾仔派发报章时,遭数名不知人士恐吓。该机构一名职员说:「五月初,多名广告客户向机构投诉指,接获多个威吓性的信息,信息中要求他们停止在报章上刊登广告。其实过去也不时遭到不知名人士滋扰,我们有时发现门锁不明所以下被损毁,有时又发现放在街上的报纸被偷。」机构已向警方报案投诉。



两名年青袭击者损毁《大纪元》位于荃湾的办公室门口。(《大纪元》提供)

六月三日,《阳光时务》出版人陈平在办公室外遭两名持着棍球棒的人,打致身体多处受伤。陈相信袭击者受过训练,不过,并不知道自已受袭的原因。他促请香港警方尽快将疑凶绳之以法,以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及独立。《阳光时务》较早时报道特首梁振英的支持者刘梦熊披露梁跟香港一所媒体合作赢取特首选举。



图: HK6 《壹集团》主席黎智英及其它媒体拥有人在二零一三年间,先后遭不知名人士连番袭击。但是,香港政府在事件后,并未发出谴责声明以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明报提供)

《壹集团》遭连番袭击。六月十九日,上市公司《壹集团》主席黎智英位于何文田的住所大门遭一部失车撞毁,并留下一柄斧头及大刀。约一周后,六月廿六日,两名男子在九龙红磡威

吓运送报纸的工人后,纵火焚毁报纸。六月廿九日,机构位于新界大埔的厂房大楼外,留下一柄长刀,同日深夜,三名蒙面人士在中环威吓两名运输工人后,放火烧毁报纸。六月廿八,黎智英接受香港《商业电台》访问时指,他相信袭击跟该集团旗下报章支持七月一日争取香港民主的游行有关。

七月三十日,《Am 730》免费报章股东之一的施永青驾车离开住所,当在路灯前停下时,遭两名不知名人士驾车撞向车的尾部。他说:「我不知道原因,不过,我相信事件不应该涉及报纸的内容或个人的观点。」施永青在中国及香港从事地产物业买卖生意。他于二零零五年创立《Am 730》,现时在该报有一个专栏。他经常为到香港的公共事务包括住房政策发表评论。

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表示:「连接发生多起针对香港媒体拥有人及机构的暴力袭击事件,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及表达自由已受到威胁。暴力是一种使社会对民主声音灭声的方法。香港政府必须要迅速及负责任确保公义,必须要谴责这些暴力行为以保护新闻自由,有关基本的人权已注明在香港的《基本法》之上。」

### 官方隐瞒消息兼更改官方信息

二零一三年,香港政府隐瞒或更改信息的行为同样引起关注。香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卷入利益冲突的丑闻事件中,香港政府新闻处被指主动更改一则新闻稿,以配合陈茂波的证词。七月底,香港《苹果日报》揭发陈的家庭成员在政府开发新界区的土地里持有一片土地,陈疑未有恰当地申报利益,被指出现利益冲突。不过,陈否认个人持有该土地上任何利益,并称已向特首及行政会议成员申报。在一次立法会的会议上,陈称该幅土地属于妻子及其家人,而他个人及家庭成员并无持有。香港政府新闻处纪



录其说话誊本并发予媒体。然而，媒体其后揭发间接持有该幅土地的公司的持有人其实是陈的妻子及儿子，遂质疑陈作出失实陈述。当媒体及立法会议员再三追问陈的时候，陈一律拒予响应。香港政府新闻处事后亦在陈原本的说话誊本里删除「其」字，并解释这并不是罕有做法，过去也曾在发出的新闻稿后数天作出修订。发言人又谓，该则新闻稿的修订是由香港发展局的新闻官处理。



香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卷入一起丑闻后，香港政府新闻处被指主动修改新闻稿以符合陈的供词。(明报提供)

十月，同样成为社会热论的免费电视牌照事件发生。十月十五日，香港政府公布香港电视网络(香港免费电视)申请免费电视牌照被拒后，有关决定旋即引起争论。媒体期后更发现自决定公布后，负责相关事务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网站上，有关申请免费电视牌照的信息中一句「批发的牌照没有上限」被删除，这句正是香港免费电视及香港政府争拗的重点，因为免费电视指控香港政府单方面更改申请的规则。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指，网页上信息的更改是因为职员不欲信息的重复所致，不过，当获悉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后，他已要求职员放回原有的句子。多名评论员对有关解释表示不能接受，因为有关句子正是争拗的重点，亦是确立香港行政会议及特首可能偏离原有政策的证明。有关句子自三月起一直摆放在官方的网页上，近半年间当中的内容从没变更。

### 保护私隐为据限制信息摘取

香港政府以保护私隐为由，意图限制记者查册商业登记纪录。二零一三年一月，国际记者联合会属会会员香港记者协会展开联署，反对政府更改规则，隐藏公司董事的资料。有关建议将阻止记者查看公司董事的身份证明信息及住址。商业登记处过去一直公开有关信息。在建议下，公众包括记者要符合一些要求下才能够看到部份信息。香港记者协会警告有关资料的隐瞒容易成为贪污的温床，该会指，倘若相关法例的附属法例获得修订通过时，将会严重妨碍媒体调查涉及不法的行为或贪污，如二零一一年区议会选举中发生的「种票」事件及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涉及「劏房」的丑闻事件。



香港记者协会联署反对香港政府图更改查看商业登记的制度，此做法阻碍媒体调查任何利益丑闻。(胡丽云摄)

香港商业登记处的查册制度对海外记者调查中国大陆的财务丑闻，同样重要。任何人若在香

港成立一所公司时,该公司拥有人有责任向相关部门提供个人信息。部门仔细而又可信的纪录制度,成为一度曙光调查中国大陆这阴暗世界在港的分公司或子公司。美国《纽约时报》及《彭博社》调查报道揭出前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家族,及现任中国主席习近平家族累积丰厚财富的事,香港公司登记的制度在当中成为一个关键的角色。不同界别包括中小企业都反对登记制度的改变。不少评论指,有关变动对小股东及雇员的权益都带来负面的影响,其它的评论则关注有关做法,可能妨碍普通的公民利用公司登记的数据来作出自身利益的保障。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指公司注册处运作的制度具侵扰者,需要更改,不过,专员承认要平衡保障私隐及摘取信息的自由。香港记者协会关注事件并指政府的做法虚伪,一方面成立了法订机构处理私隐的关注,但却又退缩未

有成立一个法订架构保障摘取信息自由。三月底,政府决定搁置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变更的附属法例。香港记者协会促请政府全面撤回有关的建议,确保记者可全面使用公司注册处的数据。

国际记者联会及会员香港记者协会向香港政府已提出多年,要求立法保障摘取信息的权利。不过,香港政府却一直拖延改革。二零一三年一月,申诉专员公署公布将会重新检视有关公开资料守则的制度,在其近期的一次声明中指出,全球已有八十八个司法管辖区立法保障人民摘取信息的权利。他又承诺,检视香港究竟是否需要立法确保档案的管理。申诉专员公署于二零零八至零九年间,接获市民投诉政府信息公开的个案有廿四起,但投诉个案到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升致五十九起。



自香港政府公布拒絕接受免费电视申请免费电视牌照后,引起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抗议,并在政府总部外集结表达愤怒。(一名摄影记者提供)

## 香港传媒业没有最差 只有更差

林曦月

2013年香港传媒业很压抑，是回归十六年以来最差的一年，但更令人沮丧的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在可见未来几年，香港传媒生态只有比现在差，不会比现在好。记者采访将面对更多制肘，传媒将面对更大压力和干预。过去一年，香港传媒发生很多事，记者被控告、采访时被打、特首发律师信给评论员和报馆等等。这些事件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大堆数据，我不想再炒冷饭，我想从亲身一些经历和感受，谈谈对这过去一年的看法。

回归前，我已在传媒业工作，过去一年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政府已不再遵守固有规格，政府在发放新闻时已变成爱怎样做就怎样做。这一年我同行家闲聊，说话间多了一句口头禅：「今日又有权威消息」。过去一年，梁振英政府在发布消息时，已不再是开记者会，开诚布公，让记者痛快地问过清楚，官员站在电视机前清清楚楚地向全港市民解说。过去这一年，梁振英政府越来越走向地下，政府发放消息，不是官员躲在办公室或家中写网志，就是找来友好传媒，隐姓埋名，发放所谓「权威消息」。然后，记者就上网抄官大人的官样文章，或拾「官媒」牙慧。

梁振英政府这种行为，剥夺了市民知情权，令市民没法全面了解政府政策，同时也剥夺了记者采访权利，打压了香港新闻自由，令香港朝向黑箱化。

为何梁振英政府会走入这种闭塞方向？我不知道原因，也不想揣测，但我忧虑的是，

这只是开始，未来几年只会更黑暗，有没有黎明我不知道。起码目前梁振英政府对此做法乐此不疲，而且梁振英亦已不理睬传媒声音，期望他任内改变做法，简直缘木求鱼。

香港传媒业的压抑，除了来自梁振英政府漠视固有规格，践踏新闻自由外，另一问题是来自西环中联办。2012年特首选举，西环公开插手香港选举事务，干预传媒采访。选举后，梁振英上台一年了，来自西环的干预，没有减少，反而变成常态化，西环也习惯了对香港指手划脚，更视为理所当然。

西环不但指手划脚，更将内地恶劣手法带到香港，试图干预传媒报道，更欲利用传媒报道打击不听话或搞事之人。

今年，内地不断收紧言论，微博大V、记者不断遭打压，其中薛蛮子和广州新快报记者陈光洲事件，值得深思，尤其是当局在处理该两宗事件的手法，更将传媒牵涉入内，利用传打击了其目标。

薛蛮子是微博大V，网络影响力很大。在官方打压网络言论下，薛蛮子涉嫌嫖妓被北京警方拘捕，央视播出他在拘留室内承认嫖妓的讲话。陈光洲则被指在报道中抹黑上市公司，遭湖北公安跨省拘捕，同样在拘留期间，央视播出陈光洲承认收钱写抹黑文章的片段。两人是否有罪，应由法院来审讯判决，但连审讯也未开始，央视就播出这些画面，甚至新闻联播也罕有地报道。央视这做法，无款就是媒体审判，令人质疑内地部门利用媒体将目标人物搞臭搞烂。

内地此作风显然已吹到香港。今年搞到满城风满的电视发牌事件，在后期突然有传媒报道香港电视王维基多年前曾在内地涉及一

宗案件，案件孰真孰假此处不讨论，有关报道亦掀起法律纠纷，也不宜讨论。我想谈的是，为何突然有此消息冒出来？消息是来自哪里？

此消息早不冒出来，迟不冒出来，却在电视牌发牌风波闹得满城风波时出现，背后耐人寻味，亦隐藏许多信息。

政府只增发两张免费电视牌照，准备最充足的王维基却名落孙山，此决定引起社会极大质款，立法会议员提出利用特权法调查政府发牌决定。有关王维基内地案件的消息，就是在立法会表决是否使用特权法前一周左右冒出来，有人向部分传媒机构发出一份有关王维基内地案件的资料，内容就如有关报道。消息发放人与西环关系极友善人，这些

人已不止一次替西环发放「新闻线索」，在2012年特首选举时亦有类似情况。是次消息提供者极之渴望，有关报道可在立法会表决特权法议案前出街。原因为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笔者知道收到有关资料的传媒机构不止一间，换言之有传媒没有刊登，他们不刊登原因我不清楚，但我乐意认为他们是基于专业决定，拒绝刊登。

这次消息发放，显然未达到发放者预期目标，但它敲响了警钟，内地利用传媒抹黑之风气已由北向南吹，未来香港传媒同行还能顶得住吗？尤其是销量不断下跌，观众不断流失，广告不断萎缩，传媒在面对生存时，还有多少脊骨？我答案是悲观的。

## 新免费电视牌照风波

新免费电视牌照是社会另一主要争论。十月十五日，香港政府公布新免费电视牌照由奇妙电视台及香港电视娱乐获得，香港电视网络(免费电视)的申请则不被接纳。公布后，立即引起社会哗然指，政府单方面更改申请电视牌照的规则。一直标榜答应提供高质素电视剧集，并曾广播已拍摄的剧集的免费电视获悉政府决定后，宣布裁减三百二十名电视台员工包括新闻部所有职工。免费电视拥有人王维基指有关竞逐，并不是一个「公平竞赛」，对政府的决定表示震惊及失望。他更指，当初是应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的邀请申请，在免费电视牌照政策的文件中，未见有发牌上限的提示。

现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指，发牌需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是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政制议题上普遍地使用的字句。苏锦梁随后不断被媒体追问有关决定时，他开始指，

决定是经过多个因素考虑包括「市场的承担能力」，并谓希望避免「过度竞争」。与此同时，特首梁振英以行政会议受保密制度规范，不能公开内容为由，不断拒予响应有关问题。不过，社会的愤怒不断升温，有媒体接获机密文件，当中揭出有关最终决定跟政府委聘的独立顾问公司，研究三个申请者申请免费电视牌照的建议相违背。有关顾问报告结论虽未有公布，但是，顾问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报告结论并没有建议香港政府在三名申请者中拣选二名申请者。

当梁振英被追问解释时，他回应谓：「不是来者不拒」及「无政治原因」。有部份行政会议成员承认「有讨论文件内容」或「不单考虑民意」。前行政会议成员周梁淑仪指，她怀疑免费电视申请被拒可能跟王不容易「控制」。新闻学者杜耀明认为决定是「绝对涉及政治考虑」，他相信牌照肯定受到现时免费电视牌照最大得益者香港无线电视有限公司影响所致。



免费电视主席王维基对香港政府就免费电视牌照上作出的决定，感到震惊及失望，并指是一项「不公平的竞赛」。(明报提供)

再者，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递交予立法会的文件中揭露，三名申请者均符合财政、技术及管理的要求，该局并说「三名申请者已展示他们符合要求」。

不过，政府持续拒绝解释，何以跟所有独立顾问报告的建议及通讯事务管理局的决定相左，同时间，决定亦不同于原有的政策。免费电视工会及香港公众事后进行大型抗议活动，多名免费电视职工及维权人士在活动后，留守在政府总部外逾两周之长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同时向立法会建制派的议员施压，使他们支持泛民主派议员引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迫使特首及行政会议披露决议的细节，但是，有关动议最终在大部份建制派议员的反对下未能通过。不过，有两名议员就承认，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代表曾游说他们投反对票。

抗议活动外，多名网民发起香港市民在《无线电视台》台庆当天「熄机」杯葛行动。香港无线电视是香港最大的免费电视台，不过，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内容就一直被批评质素低。免费电视更成功以高薪挖去多名资深的无线电视制作人员及艺员过档，并为他们发声指香港无线电视提供的合约并不公平。香港无线电视外，另一免费电视台《亚洲电视台》都同样反对香港政府再发免费电视牌照。

无线电视台庆前数天，香港《壹集团》旗下的《苹果日报》连续数天刊登杯葛及批评无线节目内容的报道。十一月廿一日，无线发出措辞强硬的声明指控《壹集团》利用旗下的报纸及杂志，针对无线并指其跟免费电视发牌事件有关，无线指有关决定是香港政府的决定，跟该公司无关。无线又指《壹集团》的报道「恣意攻击及丑化无线」，又煽动人熄机杯葛看无线的台庆。不过，有关熄机行动乃由网民发起。无线同时指控《壹媒体》制造「白色恐怖」。

《苹果日报》耗费多时报道免费电视牌照事件及无线台庆。根据《星岛日报》指，《苹果日报》刊登了六十二篇有关无线的报道，但是，全部报道都是基于事实。

《苹果日报》总编辑张剑虹对《无线电视台》封杀《壹集团》表示遗憾。他强调，该报并无计划透过失实的报道针对或恣意丑化无线。张剑虹透过该报的网站说：「《苹果日报》一直关注免费电视牌照的发牌事宜，报道亦基于事实。」

十一月，无线以《壹集团》报道免费电视牌照及台庆的新闻上「有偏颇」，公布全面封杀该集团记者包括《苹果日报》记者，拒绝记者出席电视台的活动或访问旗下的艺员。《壹集团》工会、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及新闻学者对无线的决定表达关注。香港

记者协会指有关决定干预了新闻自由, 促请无线撤回封杀的决定, 不过, 无线否认事件跟新闻自由有关。十一月廿三日, 当《壹集团》记者尝试进入无线电视城, 采访一个公共事务节目, 记者却被保安阻止进内。据《苹果日报》指, 自从无线电视公布封杀后, 集团的记者便一直被阻止采访该电视台的活动。

香港两所大学在二零一二年下旬就香港的免费电视台制作的节目, 进行民意调查, 发现每五名香港市民中有四人对现时电视台的节目质素感到不满, 并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免费电视台。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 每千名被访者中, 有约百分之七十六支持发更多的免费电视牌照; 「小区发展动力」资助的另一个大学民调中亦发现五百二十五名被访者中, 有百分之八十五支持发更多牌照, 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被访者不满意香港政府拖延公布发牌的事宜。与此同时, 调查又发现公众不满意《无线

电视》及《亚洲电视》的新闻节目。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在二零一三年亦进行了一项公众咨询, 接获七千六百份市民的响应, 接获五个主要的建议中, 其中一项认为「广播新闻报道及个人意见节目应避免偏颇、不公平及误导, 同时亦应避免自我审查。」

### 八名记者提问被指「不尊重礼仪」遭赶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十月六日, 八名分别来自《香港电台》、《Now电视台》及《商业电台》的记者连摄制队在印度尼西亚峇里岛采访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 由于有部份记者向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提问会否就二零一零年, 马尼拉人质事件中, 八名香港市民被枪杀的事作出道歉后, 印度尼西亚官方指, 记者的提问对阿基诺构成「安全威胁», 而菲律宾官方则指记者的提问是「叫嚣», 不尊重礼仪, 而驱赶离开会场。阿基诺期后在峇里岛见记者时承认, 同意把「不尊重礼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 八名香港记者被驱赶离场、恫吓及遭不知名人士跟踪后, 国际记者联会及会员香港记者协会在驻港印度尼西亚领事馆及菲律宾领事馆门外抗议, 表达不满。(王智强提供)

仪」的记者驱赶离场。翌日,所有香港记者被要求离开下榻的酒店;《香港电台》及《Now电视台》数名记者更投诉出外时,遭多名穿便服的警察跟踪。

印度尼西亚记者协会主席Eko Maryadi对主办方驱赶记者离场兼没收记者证的做法,表示失望。他指,根据印度尼西亚的法律,记者在执行职务时,不应作出任何干预。他指,驱赶记者离开的决定是践踏新闻自由。菲律宾全国记者协会总干事Rupert Mangilit指,香港记者向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发出的提问合理。国际记者联合会强调记者的责任就是提问,而政府官员有责任回答任何跟公众利益有关的问题。世界人权公约中,新闻自由是基本的权利,任何一名政府官员不能因个人的感受而限制媒体的权利。

国际记者联合会同香港记者协会于十月八日到印度尼西亚领事馆及菲律宾领事馆门外抗议,要求立即交回记者证及向所有受影响记者道歉。香港记者协会事后更与近三十个国际媒体组织向亚太经合组织发公开信,对主办方的处理表达不满。

### 香港记者在中国大陆受袭及扣留

香港记者在中国大陆采访时仍旧面对众多阻挠。三月八日,国际妇女日当天,香港《无线电视台》、《香港电台》、《商业电台》及《Now电视台》在维权人士杨匡陪同下,前赴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住所处,图采访被软禁多年的刘霞。当各人抵达住所外便被不知名人士推撞及殴打。《无线电视台》摄影师谭永文及《Now电视台》黄剑辉(译音)被拳打脚踢。谭的头、胸及脚部均告受伤。袭击记者事件引起近百名香港记者、学生及立法会议员愤怒,他们在本会会员香港记者协会及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安排下,连同本会代表游行到中央驻港的中联办抗议示威,要求彻查事件。



香港记者在中国大陆采访被殴打后,香港记者协会组织示威抗议。(胡丽云摄)

当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屠杀事件踏入廿四周年纪念之际,北京公安加强监控香港媒体。香港《无线电视台》、《香港电台》及《商业电台》记者在六月四日的清晨时份,乘车抵达天安门广场后,立即遭公安截停车辆并大叫「抓记者」。公安之后逐一检查记者证,搜查他们的车辆及盘问他们。当记者拒绝公安检查手提电话的录像时,公安以他们有肖像权为由要求查看。四名记者最后被扣留一个多小时后始获释放。一名香港记者对本会表示,公安持续地滋扰记者,在六四前更要求记者登记临时住客证;此外,他们不时发现车后遭不知名的汽车跟踪。该名记者说:「我觉得今年对媒体的监控比过去数年更严。」因而令记者采访难属或采访他们到墓地拜祭有困难。

### 中国官媒意图干预香港政治

多个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及《新华社》开始持续地批评香港问题。香港社会就二零一七年普选香港特首事件,进行热烈讨论。现时,香港的特首是经由一千二百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三名港人要求香港政府展开一个公平及平等的选举,好让香港市民能选出香港特首,否则有可能发起「占领中环」的行动。多个民间组

## 澳门新电视模式 鬼影重重

Connie

在一九九九年澳门政权交接前夕，澳葡政府因担心澳广视（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是澳门的公营电视台）的葡文频道在回归后能否继续广播，竟然私下将长达十五年的有线电视专营权批予一间葡资公司，全澳的电视传送服务突然被一间公司垄断了，因此，有线专营合约在澳门被视为一项不公义的条约。

那澳门人之前是怎样看电视呢？像很多其它地方一样，随着住宅越建越高，居民无法再用鱼骨天线（Antenna）收看电视，八十年代起一些公天公司（Communal antenna service provider）应浑而生，将电视讯号源传送至大厦各个单位，每月收取数十澳门元的网络维修费，并不是节目版权费，类似台湾早期「第四台」的运作模式。在法律灰色地带和缺乏版权意识底下，公天确实出现了版权争议，例如私下传送一些外地收费频道，后来应国际版权人要求已停播。二〇一二年，澳门政府修订《著作权法》将非法盗取有锁码的卫星频道列作刑事化，立法后市民仍可透过公天收看近百条“Free to air”的免费频道。

早已在澳门扎根的公天公司，无疑对后来的澳门有线（Macau Cable）构成很大威胁，因澳葡政府在九九年批出有线专营权之时，妄顾现实情况，并没有处理好公天的合法性、免费电视和收费电视如何定义和划分，导致往后多年来有线多次向公天公司提告，全澳九成家庭用户曾多次因此被中断电视服务。

而澳门有线也因收费昂贵、没有积极在全澳铺设网络而处于长期亏蚀的状态，六年之后要卖盘离场。

澳门回归十三年，特区政府并没有处理好历史遗留下来的法律争议，及时修正电视市场的乱象。二〇〇七年澳门有线卖盘、今年六月法院勒令政府在九十天内摆平乱局，特区政府理应出手赎回专营权，拨乱反正，尽快开放市场，重订游戏规则。但政府却一直放软手脚，至今年八月透过「台底协商」，突然宣布取缔公天公司，以超过一千万澳门元的代价，指定有线为全澳传送免费电视讯号，成就有线真的「一统天下」，将一条不平等条约执行到底，表面上是为市民着想，实质是利益输送、矫枉过正。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政府快刀斩乱麻，钱花了，但市民的信息选择权却被剥夺了。政府在没有合理解释下，假借「版权」之名把原来的免费频道大减三分之二，余下的四十多条频道，除了市民惯性收看的港澳频道，就是内地的中央频道和地方台，而台湾频道就只有「中天」和「华娱」各一个频道。即使澳门有新闻团体多次提出质疑，政府始终回避一些原来可以收看的开放频道「版权争议」为何？令人质疑政府的筛选存在政治审查，严重削弱信息流通自由。

明年四月有线专营合约届满，政府承诺会开放电视市场，但前景依然不容乐观。现正咨询的所谓新电视模式，表面上政府给了市民三个选择：一是着市民自行架设天线收看「开放频道」，但现实根本不可行，否则不会有公天公司存在；二是由政府免费提供一些「基本频道」，但这张电视菜单有甚么？是不是政府说了算？市民有没有选择权？官



方一直避而不谈；三是政府会发出多于一张的有线电视牌照，让市民付费收看「有线频道」。

从来主张用者要自付，要尊重知识产权的精神，关键是市民大众能否在一个合理价钱底下，继续享有选择多元信息的自由，而不是政府要我看甚么就看甚么、财团要收几钱就几钱。但对于电视市场的新政策，官方一直

含糊其辞，以温水煮蛙的方式麻痹市民的不满和怨气，再巧立名目将原来可以自由选择<sup>1</sup>的免费频道称之为「基本频道」，以「政府免费提供」为利诱，绝口不提官方筛选的准则。最令人担心的是，意识形态的筛选在无声无息渗入每家每户，而市民并不自知。电视在新闻人眼中可能不是一样好东西，但始终不希望沦为愚民的工具。

织要求香港政府接纳公民提名，即使有关建议并无写在《基本法》之上。亲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政客、民间组织及中央政府官员都强烈反对，认为有关建议违背《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斯怀尔及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分别表达个人对选举的意见后，中国官员立即发动官媒及三份在港的媒体批评他们「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 香港电台编辑独立受压

二零一三年，争取独立良久但终告无果而还的《香港电台》，编辑独立的方针终遇到危机。电视部高层施永远指，他与同事在处理编辑事务时，都经验到政治干预。三月十五日，香港电台员工跟广播处处长邓忍光对话，指邓忍光政治干预电视部节目制作的编辑独立。邓重复否认曾向港台员工施加政治压力。施则指，他与同事们在不同场合里都经验到政治压力。施永远指，除非在立法会内获得《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保护，否则他不会公开有关事情。是次事件甚为罕有，因为有媒体工作者主动要求立法会特别委员会彻查事件。邓忍光怀疑政治干预的节目之一是讽刺时弊的节目《头条新闻》，创作团队在新一辑节目中一度有念头用纳粹人物，之后，遭邓忍光查问意念源由。他同时被指控粗暴地意图把分析政府政策及立法会消息的节目《议事论事》转移到收视率

极低的电视台广播。二零一一年，香港政府委任公务员邓忍光成为广播处处长兼任《香港电台》总编辑。

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就《香港电台》内的风波展开调查，及希望作出措施保障电台编辑独立，确保不受政治干预。会议中，邓忍光批评二零一二年九月，《城市论坛》讨论被社会普遍认为是「洗脑」的国民教育议题时，台上摆放了两张空椅代表两名拒绝邀请出席的政府高级官员的做法，是意图使缺席者尴尬或显示他们拒绝参与。

国际记者联合会相信香港政府无意准许《香港电台》独立营运，不过，香港纳税人的公帑应用得其所。本会深信唯有加速《香港电台》变革，使之成为真正的公共广播电台，方能确保机构的自主性及编辑独立。

### 记者及媒体机构被罚款及面对诉讼

八月廿三日，通讯事务管理局经彻查后，向一所违反执业守则的电视台作出史无前例的惩罚。香港一所免费电视台《亚洲电视》被揭违反多项《香港广播条例》。通讯事务管理局指亚洲电视台的王征，在电视台的管理层或董事局中并没有任何岗位，但却不恰当地干预《亚洲电视》每天的运作。该局又指，《亚洲电视》的执行董事盛品儒不符合法例中要求的「恰当



香港电台电视部高层施永远指,他与同事在编辑处理上都经验到政治干预。(明报提供)

及称职人士」,故不应再担任董事局成员或管理层的责任;再者,该局在彻查《亚洲电视》运作时,有强烈证据证明盛品儒曾向该局提供误导的消息,意图隐瞒王征参与亚洲电视管理的性质及程度。该局要求盛离开董事局的职务,而电视台亦需因违反牌照规则,在九月二日前缴付一百万港币(约为十二万八千二百零五美元)的罚款。《亚洲电视》已就该局决定提出上诉。

根据众多媒体报道指,盛品儒由雷竞斌替代出任执行董事。雷曾任职于中央政府控制的香港《大公报》,出任执行总编辑。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指,无任何证据显示雷并不符合「恰当及称职的人士」营运电视台。不过,不少报道指,雷竞斌经常影响新闻部。不少记者包括新闻部总编辑都先后辞职。

三月二十日,《壹集团》旗下的《苹果日报》及《爽报》因刊登报道一名疑凶谋杀双亲的访问,之后,香港律政司向记者连总编辑共四人提出藐视法庭罪的指控。根据《南华早报》指,香港大学教授媒体法的教授指,检控两名前线

记者的做法甚为罕有,她指,是类个案一般检控拥有人、出版人、分销商及编辑,甚少会控告记者。

十月廿一日,《壹集团》旗下的免费报纸《爽报》宣告因严重亏损而停刊。管理层指,决定是于十月十九日才作出。苹果工会批评管理层事前没有任何警示,不过,众多职工最终获安排到集团旗下包括《苹果日报》工作。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创刊的《爽报》是《苹果日报》的姐妹报,同属《壹集团》拥有。

### 澳门媒体继续挣扎争取新闻自由及多元化

澳门的情况并没明显改善,记者继续争取更多新闻自由,公众则争取媒体多元化。隶属于澳门民主派政治团体「新澳门学社」的澳门《爱瞒媒体》,公民记者周庭希于二月廿一日拍摄两名示威者欲向中国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递交请愿信时,被澳门警方阻截及无解释下扣留五小时。扣留期间,警方扣起周庭希的录像机,并删除内里录下的影像及变更制式。澳门警方同时没收示威者散发予记者的请愿信。

国际记者联合会深切关注澳门的电视台就电视信息传送服务出现争拗,影响澳门人民摘取信息权利,负面影响社会的多元化。根据澳门的媒体报道指,十四间公天电视的付费用户,失去大量原本收看的电视频道,由现时的六十个减至只可收看三十六个频道。澳门的中级法院二零一三年六月,审理《澳门有线电视台》提出的民事诉讼时,间接指公天电视台有限公司藉非法手段,使用有线电视台网络,侵犯版权。澳门有线电视台在澳门独家拥有电视信息传送服务

牌照,有关牌照到二零一四年四月届满。事实上,澳门的电视台就有关传送权已争拗多时,不过,澳门政府仍未理出解决办法。八月廿二日,政府给公天电视台收看的频道增加多三条到三十六条。可是,电视台间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公开,引致公众不谙甄选电视频道背后的准则。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表示,人民接收多元信息是基本的人权。我们相信现时电视信息传送服务的市场垄断做法,是其中一个原因剥夺了人民摘取多元信息的权利。

# 建议

## 中国中央政府

- 一) 中国应采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员会负责捍卫及宣扬表达意见自由专员的A/HRC/23/40报告。
- 二) 中央政府应全国推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条例，确保人民可行使权利摘取信息。
- 三) 中国中央政府下达命令立即释放被囚禁的新闻工作者，饬令各省市及直辖区政府立即释放因履行职务及为公众利益而撰文的被囚记者及作家。
- 四) 中央政府下令停止所有专制及无理终止聘用、惩罚及拘禁记者的行为。有关媒体应该立即准许记者复职。
- 五) 中央政府该成立一个独立组织全面彻查新闻界内，所有中国境内外的记者曾遭遇暴力包括有政府人员背后指示的个案。中央政府确保独立的组织包括前线的新闻工作、学者及全国记者协会的代表，使违法者绳之以法，让各方明白社会不能容忍袭击媒体。
- 六) 中央政府下令各级政府的执法人员停止乱用法例威吓及使记者消音。
- 七) 中央政府下令各级政府的公职人员及公安停止阻挠、滋扰及惩处记者、新闻助理、辅助采访人士包括雇用的司机、消息来源者及被访者；同样，不准损毁或充公新闻材料。
- 八) 中央政府确保各级政府人员全面履行奥运后，中央政府延续奥运时许予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的采访权。中央政府确保各级政府人员履行二〇〇八年十月奥运时的规定，记者在中国境内可自由前赴不同地方进行采访活动。
- 九) 中央政府应下令各级政府官员确保所有记者，记者助理行动自由，及自由采访，毫无箝制。
- 十) 中央政府应下令所有处理入境政策的官员

执行国际间接纳的良好做法，让外国记者包括自雇特约记者申请护照时，涉及的相关程序是一致、及时与透明。

- 十一) 中央政府下令有关部门终止二零零九年香港及澳门记者往内地采访时，须要申请准许证的制度，让记者能继续在中国境内采访不致受到任何干扰。
- 十二) 中央政府应下令终止监视及筛选互联网信息。
- 十三) 中央政府应下令终止限制新媒体报道或互联网发表渠道。
- 十四) 中央政府应下令各省市政府不能在公众关注的事件上，操控本区或全国的通讯系统或任何时段中断通讯系统，影响民众摘取信息。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一) 香港政府应高举《基本法》第三十七条中确立人民的知情权及新闻自由的权利，及就有关权利进行公众教育与宣传运动。
- 二) 香港政府应遵守公开信息守则订立《信息自由法》及《档案法》。
- 三) 香港政府应撤换政府公务员出任广播处处长及《香港电台》的总编辑。
- 四)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应确保免费电视的多元化。
- 五) 香港特首应主动与中央政府展开对话撤销限制香港媒体在中国的采访。
- 六) 成立一个保密及独立的投诉局，处理曾经经历压制新闻自由的记者投诉。
- 七) 香港政府应指示所有政策局、部门或机构高举新闻自由。
- 八) 香港政府需指示香港警方及消防处信守承诺及时发播信息予媒体，并履行过往行之有效的惯例。
- 九) 香港政府应高举《基本法》第三十七条所订人民享有的知情权及新闻自由，指示所有政府人员以正式的记者会发布信息取缔闭门的吹风会。





Visit [asiapacific.ifj.org](http://asiapacific.ifj.org) or [www.ifj.org](http://www.ifj.org) for more information.